

武力外交與侵略戰爭—— 蔣孟引與二十世紀第二次鴉片戰爭史 研究的兩次變革

鄒子澄*

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研究史而言，蔣孟引在 1939 年留學倫敦時完成的博士論文、及回國後以此為基礎在 1965 年改訂的中文專著，充分展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政治與世界觀的變化與相互影響。兩書各自代表引入西方現代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此領域帶來的變革。蔣孟引業師韋伯斯特(C. K. Webster)具有的國際主義與現代史學理念，促成他的博士論文描繪英國因外交失敗而訴諸「武力外交」，中國則扮演始終尋求和平的角色。不過，在承認英國亦有苦衷時，該文也努力反駁英國學界的流行看法，強調英國缺乏發動戰爭的理據。但 1965 年的專著完全採用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這一改寫可部分視為蔣孟引經歷接連的政治運動後，證明自我思想改造的產物。但這部著作仍在實踐上堅持其早年篤信的現代史學方法，並非只是屈從權威的違心之作，仍應被視為在研究薄弱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領域上，探索和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的積極嘗試。最後該書雖因不符當時的典範與政治需要，遭到了名楠撰文批判，蔣孟引亦全面轉入世界史的教學研究中，但在數十年後，該書卻能樹立在此領域的經典地位。這個故事不僅關乎蔣孟引一生政治學術思想的延續與轉變，同時也是二十世紀第二次鴉片戰爭詮釋方式變遷的縮影。這不僅展示了中國近代史科學研究興起的多元性，亦揭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轉變過程中容易被忽視的延續性。

關鍵詞：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書寫、馬克思主義史學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有關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史這一學科的創生與發展，1949年前羅家倫(1897-1969)、蔣廷黻(1895-1965)、郭廷以(1904-1975)、陳恭祿(1900-1966)、蕭一山(1902-1978)等學人的貢獻已廣為人知。¹然而他們的業績主要集中在撰寫通史、提出學術口號與整理史料上。同一時代憑藉一手檔案做原創性研究、撰寫專著的學者，卻很少出現於研究討論中。這一認識的片面性也體現在對中國近代史歷史書寫問題的討論上。如李懷印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圍繞近代中國的歷史寫作，不過是投射在學術中的政治，其實質是國、共兩黨圍繞近代中國的歷史使命是現代化還是革命的合法性論爭。²但他只是根據蔣廷黻、范文瀾、陳恭祿這三位通史寫作者立論，並未涵括豐富多樣的學人群體。實則除了與國內政治相關的革命與現代化議題外，世界觀與史學觀念的變化與衝突，同樣深刻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歷史寫作。這尤其體現於一批曾為這一領域做出重要貢獻，但在後世逐漸被人遺忘的留學生群體上。³本文所欲討論的蔣

¹ Q. Edward Wang (王晴佳),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林志宏, 〈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 《思與言》, 42: 4(臺北, 2004), 頁 41-81; 戴海斌, 〈「批評」如何可能？陳恭祿與蕭一山筆戰述評(上篇)〉, 《中國文化》, 55(北京, 2022), 頁 293-325。有關討論很多，此不贅引。

²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 《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北京：中華書局, 2013), 頁 1、16-20。

³ Marc Andre Matten and Yang Zhao (楊釗), *The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Role of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1912-1949)* (Erlangen: FAU University Press, 2023).

孟引(1907-1988)便是其中一位。

如今學界熟知的蔣孟引，是中國英國史研究的開創者，也是南京大學世界史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⁴而在他的眾多著述、譯著中，出版於 1965 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⁵儘管並非純英國史的研究，但卻是他在史料利用方面最具原創性的著作，也是他早期學術生涯的代表作。同時，在整個二十世紀，該書還是中國大陸極少數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中文著述中，唯一全面利用了英方原始檔案的研究成果。⁶過去一些人雖然知道這部書的原型，是蔣氏 1939 年在英國提交倫敦大學學位申請的博士論文，但無法見到原書。⁷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語世界著作，也很少在參考文獻中開列這部學位論文。只有曾經留學英國的王曾才(1935-2020)與趙唐理引用過它。⁸黃宇和在改革開放之初到

4 錢乘旦，〈英國史研究的奠基人——蔣孟引教授〉，《世界歷史》，1995：1(北京：1995)，頁 86-89；Yu Wenjie (于文杰) and Xu Sangyi,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Jiang Mengyin,” *World History Studies* 3:1 (June 2016): 91-104.

5 即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

6 大陸與臺灣學界中，另外三部同題材著述並無條件利用英方原始檔案。而徐中約與黃宇和的專著，則較晚才被翻譯為中文引介入大陸，而且黃著偏重戰爭起因的討論，徐著則直接從《天津條約》講起。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夏竦，《第二次鴉片戰爭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姚廷芳，《新開關時期與英法聯軍》(臺北：三民書局，1982)；Immanuel C. Y. Hsü (徐中約),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J. Y. Wong (黃宇和),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由於沒有閱讀原本的條件，學者往往誤以為蔣孟引在中英文本中秉持的是同一觀點。茅海建，〈入城與修約：論葉名琛的外交〉，《歷史研究》，1998：6(北京，1998)，頁 73。

8 Tang-Li Chao (趙唐理),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8-187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Ph.D.

訪南京大學時，雖曾得到蔣孟引親贈論文副本，但他後來並沒有真正引用過這部博士論文。⁹近來只有宋逸煒注意到中英文本之間略有差異，但對這種差異的認識仍浮於表面。¹⁰實際上，1965年的中文本隱去甚至顛倒了博士論文中的許多觀點。如果不瞭解這些變化，則很難認識到原書在學術史上的開創性地位。

如果說蔣孟引撰寫博論是以現代的史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理念取代傳統觀點，二十餘年後的改寫則側重從立論方面引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權威說法。蔣孟引改寫時基本保留了博士論文中的史料與敘事結構，但徹底改換了全書主旨與論述基調，希望將該書重新塑造為一部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指導思想的專著。在新作中他絕對化地否定英國軍事及外交行為的正當性，讓其原來認可改變中國國際觀念的必要性，卻反感英國「武力外交」(armed diplomacy)手段的矛盾心態，一轉而變為對英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全面控訴。中國的整體形象也從始終尋求和平窗口，轉變為自始至終堅持對外抵抗。最終修訂本中刪除、修改、增加的內容，連同書名採用「鴉片戰爭」這一說法的變化，都反映著二十世紀這一領域歷史解釋的轉型。

正如近來研究所揭示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經歷了漫長的探索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1), "Bibliography," 30; Tseng-tsai Wang (王曾才),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China's Manage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ino-British Relations 1793-1877* (Taipei: China Committee for Publication Aid & Prize Awards under the auspices of Soochow University, 1972), 276. 趙唐理同樣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同樣由韋伯斯特指導。

⁹ 黃宇和，《帝國主義的鴉片夢 1800-1860》(香港：中華書局，2021)，頁 163、280、326、366、373、495；J. Y. Wong, *Deadly Dreams*, 152, 183-185, 191, 301.

¹⁰ 宋逸煒，〈蔣孟引和他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學海》，2017：4(南京，2017)，頁 211-216。李昊的學位論文亦未重視這一區別。李昊，〈蔣孟引史學研究〉(揚州：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 年)，頁 33-38。

時期，各時期的權威說法並非自一開始便是共識。即便是胡繩(1918-2000)、范文瀾(1893-1969)這樣的代表人物之間，在階級、民族及近代史發展的內、外因決定論問題上，也存在觀點分歧。¹¹與其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視為內涵穩定的權威不斷影響和改造史學家的過程，不如說反而是史學家通過學術討論來不斷確定、改變權威內涵。不過1949年後這一學術討論又始終受到政治變化的決定性影響。蔣孟引改寫舊作，正是希望通過扎實的檔案研究，來奠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史領域的權威地位。過去對此問題的討論或是局限於教科書，並未深入其背後的學術史；¹²又或是並未充分展示學術史發展中多方競爭的一面。¹³而蔣孟引修改舊作的故事，正是一個絕佳的個案。他的著作雖因不符合當時的主流解釋等問題，遭到丁名楠(1917-1999)在《歷史研究》撰文批判，但在數十年後卻得以奠立其經典地位，這個過程正展示了史學家與史學權威轉移的互動關係。

史學家接受新權威並進行自我改造的個案探討已有許多，但不少都帶有強調個人智識經歷斷裂與自我改造的傾向。¹⁴而那些無法公開

11 趙慶雲，《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史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12 Caroline Grover, "Reflections on Stat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Historical Pedagogy: Accounts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in Chinese Middle-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from 1912 and 200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9)；宋逸煒，〈近代歷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學月刊》，2019：3(開封，2019)，頁71-81。

13 比較概要的學術史回顧，可見葛夫平，〈建國以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綜述〉，《史林》，2014：2(上海，2014)，頁164-180。

14 如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新史學》，8：2(臺北，1997)，頁133-185；虞雲國，《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朱洪斌，〈齊思和論中國近代史學之變遷——《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晚清史學的發

表達的延續性的一面，很可能在討論中被忽視。就此而論，早年經歷如何影響他們在投身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後的學術追求，仍值得多加思索。¹⁵蔣孟引一生的政治學術思想，不能簡單視為背棄自我的過程，而須注重其中斷裂與延續兩個面向。就斷裂來說，蔣孟引在留英前以「蔣度平」為筆名發表的文章，展現他追尋獨立人格、遠離黨派政治的政治理想。這些理想後來突出地表現於內戰時期他的第三方面政治立場。來到新時代，這一過時的理想逐漸被蔣氏放棄，但其學術理想卻仍表現出延續的一面。1949年前，他身上的那種「史學南派」風格、在業師韋伯斯特(C. K. Webster, 1886–1961)影響下推崇利用原始檔案的西方現代史學觀念，以及積極追求通過學術參與現實政治的理念，仍貫穿於他此後的學術生涯，並使他矢志不渝地追求建立基於現代史學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歸國後陸續修改其博士論文的内容並發表，直至最終完成《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改寫，仍可看做過去自我主張的延續。

二、1936 年前的青年蔣孟引與他的政治學術理想

蔣孟引在進入中央大學以前的經歷，能夠瞭解得並不多。我們只知道他在 1907 年 4 月 27 日出生於湖南省新甯縣高橋鄉長坪村，原名蔣德桓，但青年時代則習慣使用「蔣百幻」(Pei-Huan Chiang)這一名字，¹⁶1940

展》校讀記》，《漢學研究》，41：3(臺北：2023)，頁 169-208；黃相輔，〈從反動右派到史學宗師：雷海宗生前身後的起落〉，《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61(臺北，2024)，頁 129-170。

¹⁵ 如李政君，〈唯物史觀與 1949 年後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中國史研究》，2017：3(北京：2017)，頁 19-30。

¹⁶ 他在中央大學讀書，以及回國後任教時，都用「蔣百幻」作為正式姓名。《國立中央大學一覽·第十二種·學生錄》(1930)，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

年代後期才改以別號「孟引」(年輕時亦曾寫作「孟影」)作為正式用名。¹⁷早年在鄉里私塾讀書時，蔣孟引據說一度因為「軍閥混戰，曾不得不中輟學業，回鄉賦閒」，於1926年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考入剛由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大學不久的國立武昌大學預科，但似乎並未在此完成大學學業。¹⁸1928年時，他又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預科。¹⁹接下來的五年(含預科1年)是他走上學術道路的開端。

彼時中大的歷史學教育並不特重前沿研究，而注重通史知識的講授。²⁰這種教育宗旨直接影響了蔣孟引未來的學術取向。在學期間，蔣孟引對中國史與西洋史都產生了濃厚興趣，均修習了不少課程，取得較好的成績(見附表1)。²¹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世界史作為自己的研究志業。後來的回憶中，他指出歷史系的年輕名教授、才從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雷海宗(1902-1962)直接影響了他的選擇。²²大學

Y8-1-809，頁97。該處檔案，後文簡稱「上檔」。

17 〈教職員姓名錄〉，《國立中央大學手冊》(1935)，上檔藏，檔號Y8-1-814，頁22；〈師範學院教育履歷著作調查表〉(1941)，《國立中央大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648-1916。

18 新寧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甯縣志》(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頁749-750；錢乘旦，〈跋：回憶我的老師蔣孟引先生〉，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499；〈附錄：蔣孟引先生學術年譜〉，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頁502。但是檔案顯示他是湖南第二聯合中學畢業的，備考。教務處註冊組編，〈國立中央大學歷屆畢業學生名冊〉(1934年10月)，《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3854。

19 〈國立中央大學錄取新生揭曉〉，《民國日報》，1928年8月31日，第1張第4版。

20 繆鳳林，〈中央大學歷史系課程規例說明草案要刪〉，《史學雜誌》，1：1(南京，1929)，頁1-4。

21 〈中大文學院史學系畢業生歷年成績單〉(1923-1936)，《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3935。

22 彼時在中大開設西洋史課程的尚有沈剛伯(1896-1977)。沈氏於1924至

一年級上學期時，蔣孟引不僅在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兩門課程上拿到高分(90、92分，見附表1)，他的兩篇學期論文，還都由雷海宗推薦發表在學術期刊上，這對一位大學新生而言自是莫大的鼓勵。²³不過這兩篇文章還算不上真正利用原始史料的專門論文。相較之下，他在大學三年級完成的論文〈兩漢太學之學生生活〉，不僅格式規範、引用史料較為全面，還嘗試與當時社會史名家陶希聖(1899-1988)商榷，已反映出比較成熟的研究意識。²⁴回國工作後填寫的一份調查表中，蔣孟引也把這篇文章列為博士論文外的唯一一篇代表作。²⁵

1933年1月，蔣氏以歷史系並列第一名的成績(同班共15人)畢業。²⁶4月24日起，留校在圖書館工作，²⁷直至1936年7月左右赴英留學。²⁸這

1927年間赴倫敦大學留學，後來也長期在中大任教，很可能影響到蔣孟引的留學選擇，或提供幫助。但其文集中並無相關記載。沈剛伯，《沈剛伯先生文集》，上、下集(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

²³ 蔣孟引，〈雷海宗先生給我的教益〉，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13；蔣百幻，〈產業革命影響說略〉，《史學》，1(上海，1930)，頁179-194；蔣百幻，〈歐洲中古封建制度概觀〉，《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2：2(南京，1930)，頁85-97。

²⁴ 蔣百幻，〈兩漢太學之學生生活〉，《史學》，2(上海，1933)，頁105-152。署1931年5月26日作。

²⁵ 〈師範學院教育履歷著作調查表〉(1941)，《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1916。

²⁶ 蔣百幻、羅孝芬以均分78，並列第一。教務處註冊組編，〈國立中央大學歷屆畢業學生名冊〉(1934年10月)，《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3854。

²⁷ 〈中大教職員名冊〉(1933)，《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1144；國立南高東大中大畢業同學總會編印，〈國立南高東大中大畢業同學錄〉(1933年12月)，《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3853；〈國立中央大學二十三年度教職員名冊〉(1934)，《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1146。

²⁸ 〈附錄：蔣孟引先生學術年譜〉，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頁502；〈教職員姓名錄〉，《國立中央大學手冊》(1935)，上檔藏，檔號Y8-1-814，頁22；〈中大教職員名冊〉(1935)，《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

一時期的其他經歷，他本人在後來的文字中絕少提起。但後來受業於蔣孟引的錢乘旦，在紀念文章中，曾留下一個重要線索，即蔣孟引在1930年代寫過一篇題為〈太平天國的婦女春秋〉的文章。²⁹今日很容易查到該文刊於《現實》雜誌，然而其署名卻是「蔣度平」。同為中大畢業生，後來的法學家韓德培(1911-2009)又在回憶中指出：

我和中大畢業的幾位進步同學蔣孟引、鄧啟東、李昌董等組織了一個「現實社」，並自己出資合辦了一個刊物名叫《現實》，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分析和評論時事及其他問題。地下黨員狄超白同志也對這個刊物給予了積極支持。³⁰

可見蔣孟引不單是在此發表過文章，而是實際參與了這份雜誌的編輯出版工作。由此則可揭開一段很少有人瞭解的往事：留英之前，蔣孟引曾與友人在南京共同創辦兩種雜誌，並在上面以「蔣度平」、「度平」、「平」的筆名發表過不少文章，包含時事評論、文學作品、史學論文等等，直接展現出他此時的學術與政治理想。

蔣氏參與創辦的兩種雜誌中，一種名為《衡風》，週刊，只在1933年發行了14期；另一種名為《現實》，半月刊，從1933年發行至1936年他去英國留學前，經營更為成功。與他共同創辦《衡風》的主要是一群中大的湖南同鄉，尤其是鄧啟東(地理學系二級，湖南新寧人)、鄭安震(心理學系二級，湖南石門人，用筆名「鄭冰島」「冰」)、李昌董(教育系二級，湖南新寧人，用筆名「李偉白」「偉」)三人。³¹有感於1931年以後的國變，

1147。最後一份檔案寫明蔣氏領薪80元，工作至1936年7月底。

²⁹ 錢乘旦，〈英國史研究的奠基人——蔣孟引教授〉，頁88。

³⁰ 韓德培，〈韓德培自述〉，收入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頁256。

³¹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姓名錄(二十一年度下學期)》(1932)，上檔藏，檔號Y8-1-123，頁25、49、59；《中央大學二級畢業紀念刊》(Shanghai: The Willow Pattern Press, 1934)，頁230、350、358、390、391。

《衡風》刊載的文章，大都為國內時事評論，尤其關注湖南的政情。³²此外蔣氏還極力推崇湖南歷史上文教的發達，並主張在充滿爭鬥的現代世界中，湖南對於民族存續仍負有重要責任。³³但此刊發行不久便夭折了。

1934年創辦的新雜誌則體現了一種更具包容性的視野和關懷。這或許是因為該刊的主辦者並不局限於湖南籍的中大畢業生。《現實》半月刊鮮明地表達出一種啟蒙青年的理念。³⁴創辦的第一年內，編輯同仁逐漸明確「計劃地系統地給予讀者以必需的各種知識」這一共識，雜誌內容與欄目不斷擴充，直到從文藝作品至國內外的時政討論無所不包。³⁵次年他們還共同擬定了〈中國現實社簡章〉，表明兩大宗旨：一、以客觀立場從事現實討論；二、激勵青年培養知識能力從而改造社會。³⁶總的看來，《現實》雜誌固然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並不願意介入政黨政治，甚至有一種反政治的色彩。蔣孟引對政治的態度也大體類此。這尤其體現於他結合親身經歷寫成的〈學潮動力之三變〉一文。該文對獨立、自發的學生運動最寄同情，視五四運動為理想，對學生捲入政黨政治則十分反感。在念小學時，他也曾隨潮流加入反基督教運動，但未料到這一運動後來也被捲入政黨政治之中。³⁷這些早年的體驗，讓蔣氏在另一篇文章中，道出了他對青年的期望：不要

32 度，〈核心工作的湖南建設〉，《衡風》，1：2(南京，1933)，頁4；度，〈湖南除貪〉，《衡風》，1：3(南京，1933)，頁3；度，〈「六一」十周年〉，《衡風》，1：9(南京，1933)，頁2。

33 蔣百幻，〈湖南人文的開展〉，《衡風》，1：11(南京，1933)，頁4-9；蔣百幻，〈朱熹與湖南文教〉，《衡風》，1：14(南京，1933)，頁2-7。

34 〈創刊辭〉，《現實》，1：1(南京，1934)，頁2。

35 〈編輯餘譚〉，《現實》，1：5(南京，1934)，頁15。

36 〈中國現實社簡章〉，《現實》，2：19(南京，1935)，頁285。

37 蔣度平，〈學潮動力之三變〉，《現實》，1：2(南京，1934)，頁3-9。

追逐流俗，「更不可糊糊塗塗地給別人搖旗吶喊，犧牲自己於白日之夢中！」³⁸實現這種獨立性的不二途徑，正是蔣氏反復申說的「認識現實」——亦即此刊取名的初衷。³⁹

然而 1936 年後，國難當前，蔣氏似乎也不再堅持舊日觀點，稱：「在這樣嚴重的關頭，『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初非有心人所當為，終非事實上所可能」，⁴⁰「我們雖不能馬上往前線正面作戰，總該儘可能地貢獻一種努力！反之，實行個人主義，最高上的不過以學者專家自期，實際終必淪為工具走狗之流亞！」⁴¹他甚至號召民眾像 1862 年南昌教案中抵抗法國那般自發地抵抗日本。⁴²《現實》雜誌也開始刊載抗戰新聞以及宣傳抵抗事蹟的文章。然而我們也無從追索蔣氏此後的心理變化，因為不久後，現實社成員星散，蔣氏前往倫敦攻讀博士學位。

總的說來，大學畢業後，蔣氏參與創辦《衡風》與《現實》兩種雜誌，在發表的文章中表達出對國內政治的強烈失落感，無論對於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沒有特別的好感，並不像韓德培後來描述得那樣與中共地下組織或「馬列主義」十分親近，甚至對中共施加於學生運動的影響較為不滿。他最初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能以現實知識啟蒙青年，培養其獨立性，使他們不要追逐流俗、盲目地捲入主義之爭與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中。直到留學前夕，抗日戰爭再次改變他的觀念。這都可以說明，蔣孟引在青年時代便積極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

38 蔣度平，〈青年也追逐流俗？〉，《現實》，1：9(南京，1934)，頁 6。

39 度，〈事實至上論〉，《現實》，1：11(南京，1934)，頁 2；度，〈勸君莫作留聲機！〉，《現實》，1：12(南京，1934)，頁 2。

40 度，〈革舊創新〉，《現實》，3：1(南京，1936)，頁 3。

41 度平，〈卷頭語〉，《現實》，3：1，頁 2。

42 度，〈老百姓的實話〉，《現實》，3：2(南京，1936)，頁 2。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未收此冊，此據湖南圖書館藏本，索書號 2654。

面向公眾寫作，並非坐守書齋的學者。

在學術方面，蔣孟引畢業後也只是主持過《現代史料》與《度齋雜誌》兩種刊物上的史學專欄，並未發表學術論文或書評。但其文章無論古今中西，皆能龐征博引，同時又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應是受到中大彼時史學教育風格的影響。這種「史學南派」的風格，貫穿於蔣氏的整個學術生涯中。⁴³在這一時期逐漸興起的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群體中，與蔣廷黻及其培養的學生相比，⁴⁴蔣孟引的學術取徑，從一開始就反映出不局限於追求科學、客觀知識的旨趣。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蔣氏缺乏現代歷史學的訓練基礎。早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蔣氏就已開始系統瞭解國內史學界及考古學界前沿的研究發現。⁴⁵創辦《衡風》時撰寫的「現代史料」欄目弁言，也反映出他重視「原料」的意識。⁴⁶只是這時他的興趣與精力，還主要集中於中國史之上。待到倫敦之後，蔣孟引驟然轉入一項全新的研究工作中。

三、蠻橫的武力外交：〈英中外交關係，1856–60〉

在 1930 年代去英國留學，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考取英國庚款生。但是這門考試的難度與競爭，都遠遠高於其他考試，西洋史科每年又

43 蔣寶麟，〈「史學南派」：民國時期中央大學歷史學科的學術認同與「學派」分際〉，《史學史研究》，2014：2(北京，2014)，頁 55-66。

44 戴海斌，〈邵循正史學三題〉，《歷史教學問題》，2022：5(上海：2022)，頁 51-56。

45 蔣百幻、也文，〈史學界消息〉，《史學》，1(上海，1930)，頁 253-268。

46 蔣百幻，〈本刊「現代史料」欄弁言〉，《衡風》，1：1(南京，1933)，頁 15。

只招一名學生。⁴⁷蔣氏最後以自費生的身分赴英留學，⁴⁸來到擁有眾多國際生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⁴⁹當時有許多中國學生來到這裡求學，如王鐵崖(1913-2003)、費孝通(1910-2005)，⁵⁰1936年還有另一位中央大學畢業生郭驥與蔣孟引一同來此讀書。⁵¹最後蔣孟引博士學位論文的旨趣和方法，明顯受到這段求學經歷的影響。

蔣氏入學時正趕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努力發展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研究的時刻。從1920年代開始，經濟史一直是史學系的重點方向，政治外交史課程則只有講師羅賓森(L. G. Robinson)和兼職教授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兩人承擔；⁵²但隨著1932年韋伯斯特(C. K. Webster)從哈佛大學來到倫敦政經學院，受聘為史蒂文森國際史講席教授(the Stevenso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後，國際史的研究逐漸發展壯大。而韋伯斯特正是蔣孟引的指導教師。

在那個外交史研究的黃金時代，韋伯斯特努力推動史學的科學化，強調徹底掌握檔案館的資料。同時，他也堅信史學不只是書齋內的學問，而是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比如對過去歷史的瞭解，有助於

47 劉曉琴，〈中英庚款留學生研究〉，《南開學報》，2000：5(天津，2000)，頁72-79。

48 〈最近一年之出洋學生調查錄〉，《民報》，1936年8月3日，第3張第1版。蔣氏被列入「留英自費生計七十八人」中，記「蔣百幼，湖南，近代外交」，「蔣百幼」應為「蔣百幻」之誤。

49 Ralf Dahrendorf, *LSE: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895-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4.

50 當時就學於倫敦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的中國留學生很多，參見王靜，《近代中英教育交流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頁141-151。

51 錢端升，《錢端升日記(1937-1956)》，上冊(收入黃進、高浣月主編，《錢端升全集》，第2輯第4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2)，頁76。

52 Ralf Dahrendorf, *LSE*, 242.

圖1 羅賓森(L. G. Robinson)與學生們(約1930年代)



說明：左2為羅賓森，左3為蔣孟引。1930年羅賓森晉升為準教授(Reader)，1932年任首任研究生院院長(Dean of Post-Graduate Studies)，負責處理研究生的日常事務。⁵³

資料來源：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 G. Robinson and Students,” <https://archives.lse.ac.uk/records/IMAGELIBRARY/317>, accessed December 27, 2024.

培養國民的國際主義、避免狹隘的民族偏見。⁵⁴他一生的政治志業，主要圍繞著尋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尤其是建立「一個世界性國家」(a “world-state”)而展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都曾為外交部服務，

⁵³ Ralf Dahrendorf, *LSE*, 242, 306.

⁵⁴ Ian Hall, “Art and Practice of a Diplomatic Historian: Sir Charles Webster, 1886–1961,”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4 (December 2005): 8–11.

也對聯合國的成立有重要貢獻。⁵⁵蔣孟引的博士論文就反映出了國際主義的觀念。同時，韋伯斯特對史學研究具有現實價值的樂觀信念與積極投身現實政治的意願，又成為蔣孟引的榜樣。

據同在 1936 年赴倫敦政經學院攻讀博士的費孝通回憶，在該校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並不強求修習課程，培養方法與能否取得學位，均由業師(Director)來決定。⁵⁶根據校方出版物，業師有責任就研究選題、應利用的檔案材料、出席哪些研討班或課程等方面給予指導。⁵⁷從當年韋伯斯特開出的課程看，他對蔣氏最重要的指導很可能是他在倫敦大學新成立的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開設的「外交史研討班」。起初該機構中這類研究性研討班(research seminars)的設立目標，就是提供學位論文的指導。⁵⁸據韋伯斯特報告，這個研討班兩週一次舉行，每次兩小時，頭幾年的討論成果已陸續見刊於《英格蘭歷史評論》(*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⁵⁹韋伯斯特通過這個研討班，確立了與許多

⁵⁵ Andrew Ehrhardt, "A 'Great Power' Man or World Stater? 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 1886–1961,"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4 (December 2023): 1116–1141.

⁵⁶ 費孝通，〈留英記〉，收入費孝通著，《費孝通全集》，卷 8(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頁 101–105、108–119。

⁵⁷ *The Calendar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for the Forty-Second Session, 1936–37*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1936), 260.

⁵⁸ David Manning, "Introduction," in *Talking History: Seminar Culture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21–2021*, ed. David Manning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24), 4.

⁵⁹ C. K. Webster, "Report on the Steven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Papers of Sir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 (hereafter Webster)* 6/1,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ereafter LSE). 從前後信件看，該報告是 1936 年 7 至 10 月間擬就的。

學生的指導關係。1935年蔣廷黻訪英時，其實也參加了這個研討班。⁶⁰不過他與一年後才來讀書的蔣孟引恰好錯過。

1937年6月，歷史研究所刊物上刊登當年1月英國境內歷史學學位論文進展情況的總表，載明「蔣百幻」的選題為「1856-1860年間的英中關係」(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56-60)，指導教師為韋伯斯特。⁶¹可見蔣孟引入學後很快便讓韋伯斯特同意指導他的論文，並且迅速確定了題目。接下來，便是如錢乘旦所說，「一頭扎進了英國的檔案館」。⁶²

三年艱巨的檔案蒐集與資料閱讀，最終彙集為蔣氏長達600餘頁的博士論文：〈英中外交關係，1856-1860〉(“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1860”)。現在可以通過大英圖書館EThOS服務獲得的這份印刷本，原件收藏於倫敦大學歷史研究所，含有非常多的打字錯誤，但大都由蔣氏本人用筆修訂過。⁶³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曾直言不諱地說道：

沒人比作者更明白這份作品有多不完整。沒人比作者更瞭解其中還有多少錯誤和缺漏。如果有更多時間，我本來還可以補入很多新的史實、方法與觀點，足夠讓現有篇幅翻倍。然而我也有不得已止步於此的理由：長期以來我都想要為我的國家服務，在這

⁶⁰ C. K. Webster to W. H. Beveridge, 10 July 1936, Webster 6/1, LSE. 但其回憶錄中並未提及。見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頁167-168。

⁶¹ William Rees, C. Daryll Forde, and D. Trevor Williams, “Historical Research for University Degre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36-7,”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5: S5 (June 1937): 14.

⁶² 錢乘旦，〈英國史研究的奠基人——蔣孟引教授〉，頁87。

⁶³ Pei-Huan Chiang (蔣百幻),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60,” <https://ethos.bl.uk/Orderetails.do?uin=uk.bl.ethos.675406>, accessed July 3, 2023.

關鍵時刻，我希望盡早回國，並為此加快了我的寫作進度。此

外，我的經濟狀況也不容許我推遲回去的日子。⁶⁴

寫作倉促之外，蔣氏還惋惜有許多未刊檔案不及利用。據他回國後發表的文章說，他是在閱讀完「業已刊印行世的有關政府公文、私人書信及著述後，始赴檔案局閱覽」，儘管每日抄錄極為勤奮，但仍惋惜「所看過的，只是短短一年的檔案與書信」，尚有許多珍貴檔案未及利用。⁶⁵儘管如此，這份學位論文還是讓韋伯斯特相當滿意。1939年，他在與蔣廷黻的通信中說：

我的中國學生剛剛完成了有關「亞羅戰爭」的學位論文。他對英國方面對這場事件的陳述做了出色的批評。我希望他能有更多時間來完成這個研究，然而他不得不在六月中旬就啟程返回中國。他的才智十分出色，如果他會到重慶去的話，我願意向你冒昧地推薦他。他的名字是 P. H. Chiang，我相信他無論在教育領域還是行政領域，都能出色地完成工作。⁶⁶

儘管有許多遺憾，蔣孟引最終完成的博士論文仍然是一份完整、成熟的作品。只是作者及其學生們後來的追述中，十分突出該文譴責英國發動戰爭的一面，仿佛原書便帶有在學術上向英國學界「控訴」的意味：

64 Pei-Huan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186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39), iii.

65 蔣孟引，〈英國檔案局〉，《讀書通訊》，103(重慶，1945)，頁 7-8。

66 C. K. Webster to T. F. Tsiang, 24 May 1939, Webster 1/16, LSE. 蔣廷黻回信中表示：「當你的學生 P. H. Chiang 先生到重慶的時候，我會看看有什麼能幫上的。」T. F. Tsiang to C. K. Webster, 7 June 1939, Webster 1/17, LSE.

這篇論文最大的特點就是用英國人自己的史料再現英國的侵華行徑，說明戰爭的責任在英國；中國軍民奮起抵抗，可歌可泣，無可指責。先生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贏得了英國老師的認可。⁶⁷

蔣孟引也曾在一份自述中說道：

我寫博士論文，是想從新的高度和方面揭示第二次鴉片戰爭，為這一方面的研究做一些開拓性工作。在我以前，還沒有人像我這樣對於過去的中英兩國關係作這樣深入、專門的研究。那時特別是西方人，談起這次戰爭，無不以美國人 Morel(按：應為 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為依據，而這本書實質上是想掩蓋真相，袒護英國，為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張目。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有責任澄清事實，聲張民族正義，斥責侵略者的行徑。在我的書中說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說的話。在撰文時，我還有意識著力於對中國軍民英雄抗戰精神的描寫，對貪官污吏的昏庸無能進行鞭策。⁶⁸

兩種說法十分接近，但其實都是把後來改寫本的形象，投射到原初的博士論文上去了。這批自述來源於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組織的一項口述計畫。奇怪的是該計畫開始於 1992 年秋天，但蔣孟引在 1988 年便已去世。⁶⁹這份自述也沒有作偽的痕跡。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是蔣氏生前就已寫好的一份自述或交代材料。而結合下文將要揭示的其博士論文的真正主旨來看，這份自述顯然帶有自我保護的意圖，很

67 錢乘旦，〈英國史研究的奠基人——蔣孟引教授〉，頁 87。

68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頁 796。

69 溪廣慶，〈前言〉，收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頁 1。

可能和在南京大學工作時他所經歷的政治運動有關。⁷⁰所以要瞭解當年那本博士論文的真相，還需仔細揣摩原本的表述。

（一）〈英中外交關係〉的主要觀點

無可否認，蔣氏的博士論文本來就表現出為中國打抱不平的態度，指出是英方而非中方對戰爭爆發負有主要責任。不過這一觀點的表述較為平和，與作者對原始史料的旁徵博引相結合，並無控訴色彩。但同時蔣孟引也以非常反傳統的方式來描寫中方的活動。為中方辯護的理據，正是中國在戰爭爆發前不懈地尋求和平，希望通過有理有據的交涉來解決爭端——甚至葉名琛(1807-1859)也不例外。這使得整場戰爭幾乎被描寫成一場外交失敗導致的「武力外交」。下面分數方面闡釋其主要看法。

其一，蔣氏完全否認英國從戰爭開始前便提出的修約、入城及進一步保護在華僑民等要求的理據，但一定程度上承認公使駐京訴求的合理性。⁷¹就修約而論，他指出英國人的修約要求，其實並不符合國際法。⁷²而進入廣州城的要求，則是《虎門條約》中英文本不對等所

⁷⁰ 據其女兒蔣以亮回憶，文革期間，蔣孟引「總是為自己的經歷一時不能澄清並給孩子帶來影響而內疚」。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尋訪故舊 感慨良多——蔣以亮女士探訪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紀實〉，<https://history.nju.edu.cn/05/61/c28497a460129/page.htm>，擷取時間：2023年7月3日。

⁷¹ 宋逸煒文突出蔣氏對其餘理據的駁斥，但對公使駐京訴求這一點上蔣氏的保留，未予以足夠重視。此外，他忽視了書中其他部分的改動，認為中英文本「最大差異就在於有關衝突原因的討論」，然後只是很簡單地討論這一小部分內容的改動，簡化了整部書的改寫情況。宋逸煒，〈蔣孟引和他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頁211-212。

⁷²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3-14.

導致，英方並無合法理據。⁷³至於英國屢屢強調當時在華僑民受辱，咎責並非總在中國。證據表明中國民眾及官員在糾紛中大都表現得十分忍讓、願意和解。挑起禍端的，經常是橫行霸道的英國僑民。⁷⁴只有在駐京公使問題上，蔣氏並不否認這一要求本身的合理性，指出傳統中國的天朝觀念與朝貢體系確實阻礙了對平等外交理念的接受。⁷⁵總之，英國發動戰爭的潛在原因中，除公使駐京一條外，其餘都是毫無理據的訴求。

其二，就戰爭爆發的直接起因亞羅號事件而言，蔣氏認為中國水師登艦執法、逮捕疑犯之舉，並未侵犯英國的治外法權，因為亞羅號執照已經過期，不再受英國保護，且登艦之時並未發生侮辱英國旗幟的事件。⁷⁶而亞羅號事件之所以升級為占領廣州的全面軍事行動，全權公使兼商務監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 1792-1872)、領事官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與兩廣總督葉名琛三人皆負有責任。蔣孟引指出英國政府本來並不強求入城，尤其不希望因為這一點與中國產生齟齬。⁷⁷然而包令卻違背訓令，自來華後便態度強硬地要求入城，好似「有一種進入廣州城的偏執」，但又逐漸認識到不動用武力，則無法讓中國政府做出改變。⁷⁸亞羅號事件的發生，正提供了引入武力來實現這一「偏執」的契機，於是他便使英國「陷入這場與中國的第二次戰爭」。⁷⁹而巴夏禮則是當時極少的本地通，又與外相、首相都有很深的關係，對許多決定都有重要影響，本人還極不怕事，精力充沛，故而一旦中英

73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3-35.

74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43-54.

75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1-23.

76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55-70.

77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75-78.

78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79.

79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82.

有事，他也不憚於、且有能力將英國拖入戰爭中。⁸⁰葉名琛的「無為政策」則是使得戰爭不可避免的最終原因。作者認為葉名琛最初避見外國使者的做法「無理至極」，有違自己作為欽差的職責，且「違背了國際友誼和善意的原則」。⁸¹作者認為若不是葉名琛，而是其前任耆英(1787-1858)或徐廣縉(1797-1869)在職，這場戰爭本來可以避免。⁸²不幸的是這一政策上的轉向是大勢所趨，第一次中英戰爭(1840-1842)結束後，耆英、穆彰阿(1782-1856)主導的那種「更自由化的外交政策」，已在咸豐帝(1850-1861 在位)登基，發布廢黜兩人的那道上諭後，一去不復返了。⁸³

本可以通過外交渠道解決的亞羅號事件，終於成為英國得以改變中英關係的一個藉口。⁸⁴蔣氏認為，儘管英方並無足夠的理據，但到這時事件本身的曲直已不再重要——一場衝突已經不可避免。巴夏禮抓住了這一機遇，促使英國採取武力改變中英關係的現狀。⁸⁵

其三，對於葉名琛，蔣氏反對以薛福成(1838-1894)「六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為代表的傳統看法，認為他是一個「好官員」，⁸⁶對其被俘後的遭遇深表同情。在亞羅號事件發生後直至廣州城淪陷期間，葉名琛轉變先前態度，有理有據地與巴夏禮交涉，不斷讓步以換取和平。若不是巴夏禮那樣咄咄逼人、寸步不讓，「本來可以避免一場戰爭，至少可以避免『亞羅』戰爭」。⁸⁷面對英軍的軍事行動，葉

80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82-91.

81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00-103.

82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96.

83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93-96.

84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05.

85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09.

86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i.

87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12.

名琛也表現得鎮定自若。⁸⁸對額爾金勳爵 (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811-1863) 向廣州發布的最後通牒，蔣氏認為葉名琛「事實上按順序逐項地、有條理地、且實實在在地答覆了」，甚至還為繼續談判爭取了餘地。⁸⁹廣州城陷，葉名琛被英軍俘獲，先是囚禁於船上，後來又被移送加爾各答幽禁，自始至終都展現出不俗的氣度。⁹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蔣氏早在此文中便反駁薛福成對葉名琛的「六不」評價。他說：

公正地說，薛福成的這一評論，儘管幾乎被所有這一主題的中文著作引用，但完全是無稽之談。從前文中，讀者應該可以明確地看到，葉名琛確實「戰」了，「和」了，也「守」了。⁹¹

葉名琛之所以不赴死，在蔣氏看來，是還希望能與額爾金勳爵乃至英國女王當面說理。直到他帶的糧食耗盡，才從容赴死。⁹²只是這段頗有悲劇感的描寫，連同蔣氏對葉名琛吸鴉片、相信扶乩等傳說的否認，在改寫本中被全部刪去。後來學術界改變對葉名琛的認知，則主要是由於黃宇和的博士論文，很少有人注意到蔣氏早在數十年前便使用過相同的檔案，提出修正性看法。⁹³甚至早在留學之前，蔣氏就已表達過類似觀點。⁹⁴

其四，認為 1858 年大沽口之所以爆發衝突，聯軍應負主要責任，因為他們沒有理由拒絕按中方提供的路線進京。⁹⁵儘管事後新任駐華

88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39-140.

89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06-208.

90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31-243.

91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41.

92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42.

93 J. Y. Wong, *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94 度平，〈「長期抵抗」的「老話」〉，《現實》，1：12(南京，1934)，頁 12。

95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57-358.

全權公使卜魯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 1814-1867)為自己多方辯護,但他實際對聯軍的慘敗負有主要責任。⁹⁶蔣孟引認為僧格林沁(1811-1865)被迫還擊具有充足理據,中方還在事件中一直表現出避免戰爭、尋求和平的態度,是英方一再拒絕通過外交渠道解決問題。⁹⁷這樣的場景,直至最後簽訂條約的那一刻以前反覆出現。

其五,對額爾金勳爵兩度來華的成績及其武力外交有較高的評價,直接稱呼他為「偉大的外交家」,並誇獎說:「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次外交行動,能以額爾金勳爵這樣少的代價,換取這樣多的成績。」⁹⁸蔣氏還強調英方的劫掠與破壞相對克制,不像法國軍隊那樣肆意妄為,正是額爾金勳爵主動約束的結果。占領廣州後,蔣氏認為額爾金勳爵便已「盡全力採取手段約束英國軍隊,維持紀律,以避免可憐的廣州人被掠奪」。甚至他還因為聯軍的劫掠無度,考慮過是否放棄廣州城。⁹⁹此外對他僅有很少的批評。¹⁰⁰總的來說,額爾金勳爵是蔣氏評價最高的英方人物。

最能總結原書宗旨的一段話,因為觸犯了许多後來的忌諱,在改寫本中被完全刪去:

英國本來可以不計較導致戰爭的那些事情,而且檢視之下,不難發現這些事本來大都微不足道,甚至有些荒唐。英國本可以奉行調和政策,花時間耐心地改變中國人的偏見,引導他們看到與外國人盡量和諧相處與合作的好處。這一政策無疑會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不幸的是,英國人沒有選擇這樣做。儘管如此,戰事結

⁹⁶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36-352.

⁹⁷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30-331, 431.

⁹⁸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98.

⁹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17.

¹⁰⁰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495-496.

束後，本可以攫取更多的英國，還是克制地僅僅拿走一小塊土地。這證明了她希望看到中華帝國變得獨立繁榮的誠意。¹⁰¹

換句話說，英國四年的武力外交活動，其目的不在於侵略、征服中國，而是希望徹底改變它的對外態度，為未來的平等交往奠定基礎。僅就這一初衷而言，蔣氏並無異議，這表明他徹底與中國傳統史書中的夷狄與對外觀念決裂。¹⁰²儘管蔣孟引一一反駁英國人以入城、修約與僑民在華受辱為基礎的理據，但他承認，中英關係的調整無法避免，而且在 1850 年代就已發展到不通過武力則無法改變的地步。¹⁰³即便不是包令 and 巴夏禮挑起亞羅戰爭，也會有另一場戰爭出現。以此為前提，讓中國通過最小代價實現對外觀念轉型，雖然不如蔣氏設想的那種「調和政策」理想，但已非不可接受了。額爾金勳爵第一次來華，奉行武力外交政策，就通過《天津條約》實現了這一目標，然而又因卜魯斯冒進而前功盡棄。

總而言之，蔣孟引懷有一種矛盾的心態：雖然從心底裡反對武力外交之行徑，批評額爾金勳爵和卜魯斯無視中國官員請求交涉的誠意，帶有一種不通過武力則無法真正轉變中國態度的傲慢，但從根本上來說，卻也並不反對他們改變中國國際觀念這一目的本身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他並不覺得侵略與反侵略是中英之間唯一可能的關係，而願意設想雙方在未來和平、互惠交往的潛在可能，並且屢屢惋惜雙方未能通過和平交涉解決爭端，才導致了不幸的戰爭。很難否認如此觀點受到了韋伯斯特國際主義思想的影響。

¹⁰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598.

¹⁰² 晚清較流行的有關史書為：夏燮，《中西紀事》（長沙：岳麓書社，1988）。

¹⁰³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9.

(二) 批評與對話

〈英中外交關係〉的直接學術對手有三人：柯斯丁(W. C. Costin, 1893-1970. 巧合的是這正是同去留學的王繩祖[1905-1990]在牛津大學的導師)、馬士(H. B. Morse, 1855-1934)，以及列文沃斯(C. S. Leavenworth)。¹⁰⁴ 蔣氏在原序中稱其目的主要是填補三人著作中留下的空白，更全面地利用檔案與私人文書重建事實經過，力圖略其所詳，而詳其所略。¹⁰⁵ 他認為這些舊作不僅檔案利用尚不全面，更重要的問題是其中利用的材料往往導向有利於西方的看法。留學歸國之初，蔣氏曾明確表示：

摩斯(即馬士 H. B. Morse)的三卷大著，只有第一卷末附錄著檔案數十件。這一方面由於他著書時准許閱看的檔案還不很多，因公開檔案的時日還沒有到。另一方面由於摩斯雖是美國人，但在英國著書終老，所以他採用的史料，都是不利於中國的，或頂多是公平的，決無本質上不利於英國的；而這類無秘密之必要的檔案，早已大量編入英國國會文書中刊行，毋勞摩斯再來鈔錄了，迄近年牛津大學研究員柯斯丁著書，始引用國會文書檔案較多，並用了些私人信件資料。他底態度也比摩斯開明，但他究竟是英國人，所以總是筆下留情，去取之間，大有文章。¹⁰⁶

這基本概括了博士論文中與兩人對話的情形。原書中引用柯斯丁的觀點

¹⁰⁴ 三本直接相關的著作分別為：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Charles S. Leavenworth, *The Arrow War with Chin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901);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¹⁰⁵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

¹⁰⁶ 蔣孟引，〈英國檔案局〉，《讀書通訊》，103，頁9。

時，蔣氏其實大都表示認同，多為示意讀者參閱，或間接引用材料；¹⁰⁷但對馬士的著作除了資料性引用外，¹⁰⁸卻還有兩處針對具體觀點的批評。一處是在談到 1857 年香港毒麵包案時，蔣孟引批評馬士毫無證據地指責中國官員參與其中。¹⁰⁹另一處有關 1860 年巴夏禮、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等人在交涉過程中忽然被中方拘捕一事，蔣氏從四方面反駁馬士對此的陰謀論解釋，認為這並非僧格林沁的埋伏，而單純是一場意外，中方行為無可指責。¹¹⁰兩處都是為中國辯護，指責馬士偏袒西方。

這部書與蔣廷黻對他所謂「修約戰爭」的研究，又有一種隱晦的互動關係。在蔣孟引於中大求學期間，蔣廷黻利用故宮新發現的《籌辦夷務始末》，在國際學界提出以中文檔案補外文檔案之不足的主張，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與史料整理成果。蔣孟引顯然十分關注他的工作，認同他的某些具體看法。¹¹¹他的博士論文參考資料中也羅列了不少蔣廷黻的發表成果。然而兩人仍有學術觀念上的重大分歧。一方面，對蔣廷黻強調新見中文檔案的重要性，蔣孟引似乎並不特別認同。他仍然把窮盡、挖掘英國的未刊檔案，與英國學者競賽，視為研究這一領域的正途。後來回憶起昔年讀檔經歷時，他還饒有深意地說：「中國學人注意這一份史料的，恐怕也是寥寥可數。」

¹⁰⁷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7, 81-82, 86, 116, 143-144, 160, 171, 176, 329A, 397, 400, 403, 405, 487, 529, 538.

¹⁰⁸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8, 43, 78, 81-82, 86, 429, 522.

¹⁰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53-154.

¹¹⁰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460-462.

¹¹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84-285; T. F. Tsiang (蔣廷黻), "The Secret Plan of 1858,"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2 (July 1931): 291-299. 蔣廷黻此文的縮寫，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慶：青年書店，1939），頁 32。

聞蔣廷黻氏昔年休假在英，曾赴檔案局探索，但不知其抄得多少。」¹¹²另一方面，蔣廷黻對「修約戰爭」的研究，帶有強烈的目的論宗旨，遺憾地申說本民族如何在現代化道路上「喪失二十年的光陰」，而不太在意清朝與聯軍在交涉、作戰中何方行為更有理據，更極少談及這場戰爭檯面上的導火線——在事發之初便極具爭議的亞羅號事件。¹¹³但這恰恰是蔣孟引在博士論文中亟欲澄清的重大問題。

除了與馬士的直接爭鋒，與柯斯丁、蔣廷黻等學者的對話，在原著中大都顯得十分溫和。然而 1965 年出版的改寫本，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他與昔年學術對手的對話，也變為帶有劃清界限、自證清白意味的政治表態。

四、內戰中的「第三方面」立場及史學理念

倉促回國的蔣孟引在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任教一年後(時校址在漢中)，¹¹⁴於 1940 年 8 月回到母校中央大學史學系工作。¹¹⁵這時中央大學已內遷至重慶沙坪壩，¹¹⁶一年級新生在市郊的柏溪分校上課。蔣

¹¹² 蔣孟引，〈英國檔案局〉，《讀書通訊》，103，頁 9。

¹¹³ 「修約戰爭」是他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用的稱呼。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204；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頁 18。

¹¹⁴ 黃啟芳，〈知識來自勤奮——訪蔣孟引教授〉，《外國史知識》，33(北京，1983)，頁 24；姚遠，《西序弦歌：西北聯大簡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20)，頁 341。

¹¹⁵ 「卅六年度已聘派教職員名冊」，〈各學院教職員名冊〉(1947)，《國立中央大學》，檔號 648-1277。

¹¹⁶ 蔣寶麟，《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163。

孟引這時開設西洋通史與英國史兩門課程。¹¹⁷但課堂之外，其實他在政治上也有極不尋常的活躍表現。這一節還原他在政協會議前後，於國內政治中的「第三方面」立場，並分析他如何在〈愚拙的美國外交〉一文中首次翻譯、改寫其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

（一）〈論今日國是〉與重慶「一·二五」學生運動

1944 至 1946 年間，自中共提出「聯合政府」主張以後，國內政局呈現出罕見的多元化局面。1945 年 8 月至 10 月的重慶談判，以及次年 1 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國共兩黨在協商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極重要的兩次會談。儘管協商以失敗告終，但是號召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第三方面力量，在此時的政治舞臺上有十分活躍的表現。¹¹⁸就在 1946 年政協會議召開前夕，包含蔣孟引在內的一群中央大學教授聯合署名的文章〈論今日國是〉，發表在《大公報》上。¹¹⁹這是蔣孟引一生中極少見，直接參與的政治活動。署名者雖然來自不同科系，但同樣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且很可能都是無黨派人士。他們的要求顯然超出兩黨能夠接受的程度，但反映出他們停止內戰與政治民主化的強烈願望。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之際，蔣孟引的身影，又出現在「一·二五」學生運動的遊行隊伍之中。¹²⁰

117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課目一覽(36 年度上學期)」，〈各院系課目一覽〉(1947)，《國立中央大學》，檔號 648-2288。

118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 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19 沙學浚、初大告、任美鏐、唐崇禮、干鐸、呂復、蔣孟引、朱伯康、吳斐丹、程式，〈論今日國是〉，《大公報》(重慶)，1945 年 12 月 31 日，第 2、3 版。

120 〈陪都學生大遊行〉，《申報》，1946 年 1 月 31 日，第 3 版；王覺非，

儘管蔣孟引參與的兩次活動背後，的確有中共方面的推動，但他本人與參與運動的很多人一樣，都是出於個人理念而行動。這些活動表露出一種十分典型的第三方面立場：要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結束內戰，建設民主制的中國。後來蔣孟引的政治身分變化，則反映其政治認同的逐步轉變：1946年時他尚未加入政治黨派，後來加入民盟，遲至1984年才加入中國共產黨。¹²¹不過，1949年留守在中央大學史學系的最後一名教授，正是蔣孟引。他此時擔任代理系主任。¹²²政治秩序劇變之際他的心境，則已無從窺測。

(二) 1859年華若翰入京之旅的再闡釋：對博士論文的首次改寫

容易為人忽視的是，蔣孟引對其博士論文的改寫，早在1940年代便已開始。最初的一次改寫，是《大學評論》上的時事評論。該文利用美國過去外交失敗的兩個案例，來說明當下美國外交政策的「愚拙」。從時間來看，這明顯是針對日本投降後美國對日扶持態度的批評。1948年該文發表前幾個月，國內頻頻發生相關的大規模抗議。¹²³

《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165。

¹²¹ 孔夫子網流傳有一份蔣孟引親自填寫的個人資訊表，「現屬黨派」一欄填「民盟」。見〈英國史教學科研人員登記表〉(1981年11月5日)，《孔夫子網》，<https://book.kongfz.com/10196/1015743583/>，擷取日期：2023年7月3日。

¹²² 王覺非，《逝者如斯》，頁241-242；〈中大教職員移交清冊〉(1948、1949)，《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1041。檔案顯示1948年蔣孟引正在休假，次年代理賀昌群的系主任職務。

¹²³ 有關1948年的「反美扶日」運動，請參考左雙文、陳偉，〈1948年「反美扶日」運動及其與國民政府的互動〉，《廣東社會科學》，2006：6(廣州，2006)，頁101-107。

文中第一個個案，即 1859 年美國公使華若翰(John Elliott Ward, 1814-1902)入京換約的故事。這其實是根據蔣氏博士論文中的幾頁內容改寫而來的。¹²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改寫顛倒了原來的學術觀點。

最初蔣孟引討論華若翰入京換約，認為中方相關的接待與安排均十分得體，不存在刻意刁難之事，¹²⁵並由此論證英使卜魯斯本應像美使一樣，尊重中方安排，如此本可避免大沽口的衝突。然而〈愚拙的美國外交〉卻完全改變了看法。雖然引述材料大體相同，但該文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稱中國對美使入京的安排，充滿歧視與刁難。¹²⁶由此引出對美使的批評：面對如此不公、不體面的對待，還要主動入京換約，成就中國的「外交勝利」，自然說明了美國外交的「愚拙」——而這種「愚拙」同樣體現於當時對日援助的政策上。

在抗戰及內戰的背景下，學者們悖離學術獨立主張的例子，實不少有。如王汎森對傅斯年(1896-1950)撰寫《東北史綱》等活動的討論，就反映出民族主義情緒與學術客觀性理想如何共同塑造這一時期學者矛盾的生命追求。¹²⁷蔣孟引為何在此時輕易改變舊作觀點、附會自己對現實的看法，儘管也可從這一點來理解，但仍是一個難以完全解釋的謎團。¹²⁸也許早年中央大學的史學教育、韋伯斯特的言傳身教皆有一定影響。儘管 1947 年時蔣孟引便反對「以歷史科學做幌子，卻將歷史作為論戰的軍火庫」，「有一種理論，一個主義，要使人相信，

¹²⁴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48-352.

¹²⁵ 有關華若翰入京一事，其實博士論文與 1965 年中文本的差異不大，只是中文本增補了一段中方有關此事的記錄。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50-352;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59-160。

¹²⁶ 蔣孟引，〈愚拙的美國外交〉，《大學評論》，1：5(南京，1948)，頁 4。

¹²⁷ 見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 173-252。

¹²⁸ 蔣孟引，〈歷史知識與歷史科學〉，《學識》，1：5&6(南京，1947)，頁 17。

便到歷史中去找論據，每每不惜削足適履地摘取材料」，但仍然強調中國傳統史學中以司馬遷為代表的「通古今之變」的追求及其價值。¹²⁹

但蔣孟引對史學根本方法及由此構成的科學性的認識，自始至終不曾動搖。他對原始檔案研究的科學性抱有很樂觀的看法，認為只要「廣集原始的資料(當時及當事人的作品)及別人撰述的資料，予以鑑辨及分析，加上自己合理的想像」，¹³⁰史學便擔得起科學的名號，提供客觀的知識。這一基本觀念仍然貫穿於他修改後的著作中。

五、1949 年後的政治運動與蔣孟引的學術寫作

1949 年 10 月，已被中共接管的中央大學正式更名「南京大學」。1952 年院系調整中，南京大學與金陵大學合併。¹³¹蔣孟引的後半生就居住在南大小陶園內，¹³²完整地經歷了 1950 年代後，南大校園內自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的政治運動。¹³³錢乘旦對蔣孟引在這一時期的經歷，有一段簡短的總結：

他經歷了每一場政治運動，從思想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他對每一場運動都認真真地參加了，既不出頭，也不出格。他

曾經努力地「改造」世界觀，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還是要挨

¹²⁹ 蔣孟引，〈歷史知識與歷史科學〉，《學識》，1：5&6，頁 16-17。

¹³⁰ 蔣孟引，〈歷史知識與歷史科學〉，《學識》，1：5&6，頁 17。

¹³¹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291、302-303。

¹³² 蔣孟引育有二子四女。見戴寧生，〈南大從前有個小陶園〉，<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04/7119.html>，擷取日期：2023 年 7 月 3 日。

¹³³ 曾冠傑，〈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及其前後(1949-1952)：以南京大學為中心的考察〉，《政大史粹》，18(臺北，2010)，頁 99-126。

批鬥，還是要去接受勞動改造。¹³⁴

本節所欲討論的幾篇文章，大都是蔣孟引在特定的政治運動中寫下的。這些文章確實反映出他「改造世界觀」的努力，也基本符合「既不出頭、也不出格」的判斷。然而易被忽視的是，蔣孟引在《人民日報》與《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兩篇文章，仍然是他根據博士論文內容改寫而成的。與〈愚拙的美國外交〉不同，這時他的寫作不僅取決於內心真實想法與學術見解的變化，還受到外部政治壓力的直接影響。在這一時期快速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蔣孟引寫作中不得不直面、回應乃至順應的新權威。

蔣孟引在英國史研究方面的聲望，也是在這一時期逐步樹立起來的。儘管蔣孟引回國至中大任教之初，就已開設英國史課程，但是他在英國本國史領域內，很長時間中都沒有具原創性的研究成果。教研室制度成立後，他被分配到世界近代史方向，更要承擔起對於世界各個不同國家與地區歷史的教學工作。¹³⁵1957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他這一時期的教學成果之一，實際是由授課教材《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改寫而成。¹³⁶1957年「鳴放」結束後，雖然許多對學

¹³⁴ 錢乘旦，〈跋：回憶我的老師蔣孟引先生〉，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頁499。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文章中刪去。

¹³⁵ 據王覺非說，王繩祖與蔣孟引在分配世界近代史這門必修課的教學任務上，產生過矛盾，後來對半分配。王覺非，《逝者如斯》，頁277-278。有關教研室制度對科研工作帶來的變化與影響，參見Xin Fan(范鑫),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94-97.

¹³⁶ 蔣孟引，《第一次世界大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蔣孟引，《世界近代史》(油印本教材，1954)，頁431-525。該書沒有封面，書頁上端印「(蔣)世界近代史」，且書前《世界近代史(1642-1917)教學大綱》註明「南大歷史系三年級1954年度第二學期」，故可判斷是蔣孟引使用的課程教材。

圖2 1961年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合照中的蔣孟引



說明：第2排右5為蔣孟引，右4王栻。

資料來源：〈南京大學歷史學系1956級全體同學畢業留影〉（1961年6月19日），《桃李芬芳：南京大學歷史系110周年紀念冊》，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編印，2012年5月，無頁碼。

校及黨的批評被視為右派對黨的進攻，但其中一部分的學生意見仍然得到重視，其中就包括讓老教師多開選修課的提議。由此蔣孟引便恢復了過去開設過的英國史課程。¹³⁷1964年，蔣孟引終於出版了他在英國史方面的第一部專著《英國史論叢》。¹³⁸文革結束後，他更是將全

¹³⁷ 〈邊整邊改：氣象、歷史兩系接受意見改進教學工作〉，《南京大學》，第150期，1957年10月31日，第4版。

¹³⁸ 蔣孟引，《英國史論叢》（南京：南京大學教材科，1964）。這部書只印了160部。

部精力都投入到英國史的研究之中。¹³⁹故而蔣氏對英國本國史的研究，實際上可以說是他在後半生另辟的園地，但這一方面的貢獻卻成就了他今日為人熟知的形象與學術地位。限於篇幅及主題側重，後文不會討論他對英國史的研究，而集中展現文革前他如何改造自己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舊作，並討論其中折射出的歷史書寫轉變及其影響因素。

(一)美國對臺灣的「第一次」企圖：對博士論文的第二次改寫

1950年蔣孟引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美國奪取臺灣的第一次陰謀〉，延續了他在國共內戰時期對美國外交的批評態度。只不過這次批評的重心從其外交的「愚拙」，變成了帝國主義侵略野心。這篇文章也是對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1893-1971)《美中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of 1944-1949*)的直接回應之一。該《白皮書》發表後，以毛澤東(1893-1976)「六評」、劉大年(1915-1999)連載的〈美國侵華史〉為代表，中共通過《人民日報》這一陣地，對《白皮書》內容發動輿論宣傳戰，指出過往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絕非《白皮書》所宣傳的中立友好，而是始終抱有侵略野心。¹⁴⁰蔣孟引在文章開頭就附和稱，《白皮書》所謂中美「傳統友誼」、美國「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純為謊言。他認為美國的侵略陰謀，早在九十年前便已暴露出來。

139 代表性成果為：蔣孟引主編，《英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蔣孟引，《英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

140 翟韜，〈後殖民視野下的中美輿論宣傳戰(1949~1951)〉，《美國研究》，2023：1(北京，2023)，頁138-160。

容易忽視的是，〈美國奪取臺灣的第一次陰謀〉其實是蔣孟引從博士論文中截取、翻譯的一段內容。¹⁴¹這段內容後來也出現在 1965 年中文本內。¹⁴²除了增刪少數引文，略去一段英國內部對臺灣地理及經濟價值的討論外，大都忠實於原來的表達與行文順序。¹⁴³該文講述 1856 年美國駐華公使伯駕(原文譯名用「巴克」，Peter Parker, 1804-1888)希望利用占領臺灣促成中國出面修約的計畫。這個計畫幾乎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占領舟山計畫的翻版：伯駕提出，英、法、美可以分別占領舟山、朝鮮與臺灣，迫使中方出面交涉。而計畫最終告吹，主要是這樣的分配讓英、法方面覺得不公，且英國內部早就有臺灣地理、經濟價值高於舟山的共識。在博士論文中，蔣氏原用這一點來說明聯軍內英美兩國間的矛盾，現在撇開這一內部矛盾不談，聚焦於美國的領土陰謀，用以批評其現實的外交政策。¹⁴⁴這次改寫是否為自主行為，又是否可以說明其心靈世界的變化，其實難以推論。但這無疑可視為關心現實政治，並希望能通過學術有所貢獻這一先前理念的自然延續。

(二) 1950 年代運動中的學習改造與「不出格」表現

1950 年代蔣孟引雖在政治運動中「並不出頭，亦不出格」，但並非完全置身事外，在南大歷史系的歷次運動中，他也不得不表現出一定的政治積極性。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他就撰寫過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歷史學」的文章，展現了他當時積極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成果，

¹⁴¹ 蔣孟引，〈美國奪取臺灣的第一次陰謀〉，《人民日報》，1950 年 1 月 27 日，第 5 版。

¹⁴²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253-259。

¹⁴³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539-544.

¹⁴⁴ 與此不同的看法，見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1784 年~1894 年)》(臺北：三民書局，1985 第 2 版)，頁 293-314。

文章的風格幾乎是純哲學的。¹⁴⁵1957年整風運動時，他在公開場合對系內右派劉敬坤(1923-2009)的批評，也大都避重就輕。¹⁴⁶這樣的態度也表現於1958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中。此時歷史系的老教授陳恭祿成為運動所打擊的中心對象。不過這次運動與之前不同，教師可以不必接受當面批鬥，運動主要以書面形式進行。¹⁴⁷南大歷史系在此時創辦的刊物《史學戰線》，第二期就組織了批判陳恭祿、王棣(1912-1983)等教師的專輯。蔣孟引撰寫的〈批判陳著「中國近代史」一頁中的十五條謬論〉也在其中，後來還被《歷史研究》與《讀書》轉載。¹⁴⁸不過從原手稿看，他對陳著的批評，形如筭記，本來只是就事論事，提出陳氏利用史料的原創性不高，襲用馬士的觀點與材料較多，而且認識有許多誤失，但根本沒有在政治上上綱上線的討論。¹⁴⁹只是在《史學戰線》正式發表時，才在這份筭記的首尾補上兩段文字，提到了該書的立場問題，最後歸結於「立場反動，觀點謬誤，專為帝國主義和

¹⁴⁵ 蔣孟引，〈歷史科學工作者必須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兼斥胡適關於世界近代一些歷史現象的謬論〉，《教學與研究彙刊(人文科學)》，1(南京，1956)，頁23-30。文章署作於1955年9月15日。

¹⁴⁶ 〈歷史系教職員繼續開會揭露劉敬坤的反黨言論駭人聽聞，許多老教授極表憤慨並列舉事實予以駁斥〉，《南京大學》，第139期，1957年7月1日，第1版；甄為民、史越峨，〈南大右派分子碰壁記〉，《人民日報》，1957年7月12日，第5版。

¹⁴⁷ 王覺非，《逝者如斯》，頁364。

¹⁴⁸ 蔣孟引，〈從對亞羅事件的分析看陳恭祿先生的歷史觀點——評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中的一頁〉，《歷史研究》，1958：12(北京，1958)，頁53-62；蔣孟引，〈評陳恭祿對亞羅事件的觀點〉，《讀書》，1959：2(北京，1959)，頁38。

¹⁴⁹ 蔣孟引，〈從對亞羅事件的分析看陳恭祿先生的歷史觀點——評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中的一頁〉，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頁365-379。原署1958年10月20日，應為最早的手稿原件。

反動統治服務」。¹⁵⁰然而全文仍然只提到一次「資產階級史學」問題。後來《歷史研究》轉載時，才又增加「資產階級史學著作」、「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兩處表述。¹⁵¹

蔣孟引批評陳著《中國近代史》中的這一頁，正是有關亞羅號事件的討論，並且他同樣利用了自己博士論文中的觀點與材料。這 15 條筭記大體可以歸結為三方面的批評：其一，在亞羅號事件發生時及其後的交涉中，英國負有全部責任，陳恭祿不應強調葉名琛的錯誤。亞羅號船照尚未過期以及所謂辱旗事件，都是襲用自馬士的錯誤觀點。其二，對當時廣州的人民起義，應予以積極評價，不應歌頌統治者對此的鎮壓。其三，本地民眾以謀殺等手段戕害英國海軍士兵，是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合理抵抗，不宜譴責，而且香港的毒麵包案也絕非麵包師的陰謀。¹⁵²

對陳恭祿的批評，也是蔣氏思考如何改造舊作的一次機會。原來他也認為葉名琛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負有一定責任。對於人民起義，他原本也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用貶義詞來描述的。¹⁵³不過亞羅號事件中英方行為缺乏理據、毒麵包案並非清政府陰謀這些舊看法，卻仍符合新政權對於這場戰爭解釋的期待。為中國打抱不平的這種態度，因此成為他隨後改造博士論文時無限放大的一個側面。而那些論及中國國際觀念落後、葉名琛交涉之不當等種種帶有將英國發動

¹⁵⁰ 蔣孟引，〈批判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一頁中的十五條謬誤〉，《史學戰線》，2(南京，1958)，頁 16-21。

¹⁵¹ 蔣孟引，〈從對亞羅事件的分析看陳恭祿先生的歷史觀點〉，《歷史研究》，1958：12，頁 53、62。

¹⁵² 蔣孟引，〈從對亞羅事件的分析看陳恭祿先生的歷史觀點〉，《蔣孟引文集》，頁 365-379。

¹⁵³ 他原稱太平軍為「叛亂者」(rebels)。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9.

戰爭行為合理化意味的討論、對人民起義不適宜的表述，都一概隱去，不復提及。在同一年為「史學革命」運動撰寫的文章中，他已公開表達不迷信原始史料的態度，提出「要先看寫東西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絕不能「既不站到廣大人民的立場上來，亦無科學頭腦，完全被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資料牽著鼻子走」。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拋棄了青年時代接受的史學價值觀。文章中他也寫到，「正是事實——具體現象和事件，才成為史學家進行科學概括、確定人民歷史上局部的和一般的規律的基礎」。¹⁵⁴

六、控訴侵略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如何改造舊作

在博士論文提交 26 年後才翻譯出版的中文本，不僅是將原文簡單直譯、修繕後便付梓的中譯本。雖然它確實改進了原作，比如增補了原來不甚重視的中文史料以及極少數英文檔案，¹⁵⁵將部分表述與引用精煉化，但最大改動是將原來的敘事結構盡量原封不動地納入全新的解釋體系中。為此，開頭與結語被完全重寫；中間各章節，儘管標題大為調整，但內容都是基於原作翻譯後，再經刪改、增補而來的（見表 1）。而且各章內的改動，也主要是在結論性、判斷性語句上。

¹⁵⁴ 蔣孟引，〈建設社會主義的戰士都來寫現代史〉，《江海學刊》，1958：5（南京，1958），頁 66、69。

¹⁵⁵ 這部分檔案主要是格蘭維爾文書（Granville Papers）。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78、168-170。

表 1 蔣孟引博士論文及其中文改寫本目錄對照表

1939年博士論文	1965年中文本
Preface	引言(全部重寫)
Introductory	一 英國發動戰爭的「理由」，全部荒謬
1 Underlying causes of conflict	
2 Immediate causes of conflict	二 亞羅戰爭
3 The “Arrow” incident	
4 Lord Elgin’s armed diplomacy	三 廣州的淪陷，津滬的談判
5 Prince sang-ko-lin-sin’s military resistance	四 大沽之戰
6 The last campaign	五 最後的戰鬥和談判
7 Rivalry between western powers in China	六 戰爭期間英國和它的夥伴的矛盾
General observations	結束語(全部重寫)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十餘年間，經歷了一場場政治運動，努力學習過「革命導師」的經典作品，蔣孟引對新的史學權威已經有了一定理解。但仍將面臨的問題是：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真正立足於原始檔案研究的專著尚無前例，「革命導師」的經典論述也還不足以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解釋體系。對此，蔣孟引一面根據權威說法修改自己的觀點，突出原著在戰爭正義問題上的批判性看法，但另一面則努力按照自己根植心中的現代史學觀念，來主動創造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需要的權威解釋。

(一)「英國發動戰爭的理由，全部荒謬」：對博士論文的第三次改寫

1962年蔣孟引在《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駁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其實是對博士論文引論及第一章內容的翻譯與改寫。¹⁵⁶這是他第三次修改舊作並以中文發表，但也是他首次嘗試系統改造博士論文。這篇文章與1965年中文本中的正式內容相差無幾，從為數不多的改動看來(刪改居多)，該文更接近英文原作，¹⁵⁷尚包含一些不利於論證英國發動戰爭毫無理據的表述。¹⁵⁸對於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這一問題，1962年論文及1965年中文本與原作相比的最大改動，一是完全刪去有關當時中國國際觀念落後的表述，對任何可能被認為合理化英國發動戰爭行為的理由，全都避而不談，並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英國發動戰爭的『理由』，全部荒謬」(1965年正式本章節標題)；二是進一步認為英國發動戰爭不是為了修約，而是為了擴大應該已經使它滿足的在華利益。從這一角度，蔣孟引增補了對戰爭爆發的經濟層面解釋。

為論證英國發動戰爭毫無正當性這一點，原作中對英方修約、入城以及進一步保護在華僑民等要求理據的反駁，幾乎不需改動便可派上用場。最大的問題，是原書中談到公使駐京要求時，認為中國傳統

¹⁵⁶ 據《蔣孟引文集》，該文作於1961年5月3日。蔣孟引，〈駁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頁364。

¹⁵⁷ 蔣孟引，〈駁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2：1(南京，1962)，頁58、62-64。

¹⁵⁸ 蔣孟引，〈駁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2：1，頁60。

對外觀念本就不合時宜，言下之意即公使駐京的要求並不過分。¹⁵⁹蔣孟引原來還說：「看起來除非再打一場戰爭，否則斷無辦法在京設立英國公使館。」¹⁶⁰這看起來更像是為英國發動戰爭辯護。於是他刪去了這些討論，並從英國企圖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侵蝕中國外交決定權的角度增補了一些論述。¹⁶¹

在否定正當性後，蔣孟引還更進一步指出，英國根本也不存在提出修約並發動戰爭的需求。原作中對戰前形勢，本來認為：「通過《南京條約》建立，並隨貿易擴張而發展的兩國關係，對於雙方而言仍是不讓人滿意的。」¹⁶²尤其是對華貿易根本沒有像英國預期的那樣，出現較大的增長。但是現在這一結論被完全顛倒過來(且引用史料相同)：「可見在經濟方面，南京條約應已使英國資產階級滿足了。」¹⁶³然而，「資產階級的慾壑沒有底，向外侵略狂也沒有止境，他們竟叫嚷南京條約還不夠，還要進一步侵略中國。於是千方百計地製造種種侵略的口實，首先是所謂『修約』」。¹⁶⁴歸結起來，英國本應滿足，卻出於資產階級的本性，貪婪地發動了另一場侵略戰爭。

這種貪婪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尤其是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源自列寧的理論)。修約僅僅是藉口，「英國這次打仗的真正原因乃是資本主義的侵略狂」。¹⁶⁵為此蔣孟引增補了相應的經濟層面解釋，

¹⁵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1-23; 蔣孟引, 《第二次鴉片戰爭》, 頁 13。

¹⁶⁰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9. 這一句在中文本中刪去。

¹⁶¹ 蔣孟引, 《第二次鴉片戰爭》, 頁 13-14。「其次」一段末 3 行、「第三」一段末 6 行, 皆為新增內容。

¹⁶²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7.

¹⁶³ 蔣孟引, 《第二次鴉片戰爭》, 頁 5。

¹⁶⁴ 蔣孟引, 《第二次鴉片戰爭》, 頁 6。

¹⁶⁵ 蔣孟引, 《第二次鴉片戰爭》, 頁 27。

指出儘管英國瞭解對華貿易無法大幅增長有其原因，但仍然「只圖滿足自己的主觀貪慾，硬要迫使清政府進一步屈服」。¹⁶⁶並且，在 1962 年論文中新增的這部分內容，在正式本中又擴大了不少篇幅。正式本還提到了 1962 年並未提及的鴉片進口問題，儘管並未進一步闡發這一點與該戰爭起因及命名的聯繫。¹⁶⁷

(二)對博士論文其餘內容的改寫

在 1965 年的中文本中，蔣孟引對中英兩國在戰爭中角色與形象變化的改動也十分引人注目。原來努力尋求和平的中國，在新作中呈現出對英國滿懷敵意、竭力抵抗的形象；英國則從迫使中國加入國際秩序的強硬干預者，變成了肆意妄行、慾壑難填的侵略者。兩國形象的變化，使得由修約與亞羅號事件引發的一系列對抗，在整體形象上從一場武力外交行動，變成一場完全不義的侵略戰爭。

原作中包令、巴夏禮與葉名琛三人的性格特點，本來是導致戰爭爆發很重要的因素。但中文本中刪去了對包令、巴夏禮早年經歷及性格的介紹，使得對戰爭爆發的個人因素討論邊緣化。¹⁶⁸原作雖認為葉名琛起初「傲慢且頑固，臭名遠揚」，¹⁶⁹導致衝突升級，甚至因此說，如果那時在職的不是葉名琛而是徐廣縉、耆英，則戰爭根本不會爆發，¹⁷⁰但中文本中刪去這些話，避免為英國發動戰爭提供合理性。在抹去個人因素的同時，作者將戰爭的爆發更多地歸因於國家態度。原作中英

¹⁶⁶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29。

¹⁶⁷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28。

¹⁶⁸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73-74, 86-91. 對應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41、46。

¹⁶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11.

¹⁷⁰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96.

國政府本不希望挑起紛爭的說法也被刪去，¹⁷¹取而代之的是控訴英國政府蓄意發動戰爭，並為此製造藉口。認可英國改變中國國際態度這一目的，卻反感其武力外交手段的原初主旨，在新作中也不再有任何體現。舊作中對英國的矛盾心態與理性批評，這時也變為全面控訴。

亞羅號事件與卜魯斯強闖大沽口兩事，曾在英國內部激起很大爭議。對這兩部分的討論，原來蔣氏十分倚仗英國內部官員的批評意見，但現在他也和這些批評者劃清界限，說他們的批評只是對侵略行為的招認，而並非真正反對侵略。¹⁷²一些議員對英國政府的批評，是「假惺惺」與「偽善」，是「講究一點侵略手腕」。¹⁷³比如，原作中他說大沽口英國大敗的消息傳回國內時，「許多明智的倫敦政治家還在期待和謀求和平」，但中文本中相同位置就變成了「有些講究侵略手腕的人大為不安」。¹⁷⁴英國內部的鬥爭，最大的意義只在「顯示了英國議會對於亞羅戰爭這一可恥的野蠻的侵略罪行的招認」。¹⁷⁵

除了英國總體形象外，蔣孟引對中國總體形象的描述也全然改變。他不再強調中國人在戰爭過程中屢屢表現出追求和平、誠心交涉的態度，而認識到應該更多表現中國人如何反抗侵略。比如在大沽口大敗聯軍之後，原文曾說，中國內部「更多地僅僅是感到緊張不安，而非喜悅、驕傲」，並且徵引咸豐皇帝的上諭，希望以此說明「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善意」，還稱「恐怕只有當英國人學習中國人的這種態度，才能真正永保中英之間的和平」。¹⁷⁶但中文本中，相同地方則換

¹⁷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77-78.

¹⁷²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73、78-79。

¹⁷³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64-165。

¹⁷⁴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406-407；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75。

¹⁷⁵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80。

¹⁷⁶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31, 333.

為：「這些都顯示了咸豐的怯懦可恥，不能代表人民抵抗侵略的堅強意志。」¹⁷⁷

雖然舊作本就高度評價中國軍隊的抵抗，稱「儘管武器上處於劣勢，但中國軍隊在作戰中有完美的表現」，¹⁷⁸不過這主要是針對正式部隊而言，民眾自發的抵抗，尤其是暗殺、劫殺，蔣氏並沒有大加讚譽。對於民眾仇外行為，他本抱有批評態度。¹⁷⁹而且在原作中，他原本也不忌諱談到中國軍隊在實力上不敵對方。比如《天津條約》簽訂前的最後戰事中，他原說：「總體看來，在到處是叛亂、府庫空虛、武器過時、士兵未受訓練、人民窮困淒苦的前提下，中國無力進行抵抗。」¹⁸⁰後來此處表述卻改為「由於人民革命運動方興未艾，便有許多人堅主賣國投降，『安內而後攘外』」。¹⁸¹客觀條件限制變成了人為因素影響。又比如《天津條約》簽訂後，中國加強防備，但蔣孟引評論：「他(何桂清，1816-1862)未曾認識到，倘若外國人有意，這樣的防禦工事無法阻擋他們進入京城。」¹⁸²後來這段文字也被簡寫為「熱火朝天地設防備戰」，不見原來的消極看法。¹⁸³

除了修改表述外，蔣孟引還利用中文史料，增補了非常多描述清朝軍隊、團練與群眾英勇抵抗的記錄。¹⁸⁴由於原書是從英國視角講述

¹⁷⁷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53。

¹⁷⁸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ii.

¹⁷⁹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6.

¹⁸⁰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81.

¹⁸¹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23。

¹⁸²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301.

¹⁸³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37。

¹⁸⁴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01-102、113-114、119-121、125-128、143-145、147-148、151、159-160、179-181、192-193、199-200。這僅僅是改動較大(增補段落)的例子。

這場戰爭，故而對中國方面的情況著墨有限；現在面向中文讀者改寫舊作，勢必要更多呈現中方情況。英國上、下議院辯論的場景描寫減少了很多。¹⁸⁵對於群眾以暗殺等手段抵抗侵略者，蔣孟引修正了原作中的冷淡態度。在引述廣東鄉勇劫殺英國郵船的事件時，他評論稱：「中國人民被外國侵略者殺死或害死的，何止千萬；這次報復一下，殺了幾個侵略隊伍中的傢伙，更是應該的。」¹⁸⁶對於原來力圖駁斥為不實的香港毒麵包案，他補充說：「然而如果確是中國人放毒謀殺外國侵略者，也是理所當然，勢所必至，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¹⁸⁷

英國的全面侵略形象，與中國的全面抵抗形象，是新作中十分鮮明的立論基礎。而原作中作者傾注最多筆力來討論的兩個人物，葉名琛與額爾金勳爵，也在中文文本中呈現出全然不同的形象。對於葉名琛的討論，除了不再強調他的個性與行事風格對戰爭爆發的影響、他的悲劇性結局，還重新評價了他與英方交涉前後的態度。現在蔣氏認為，葉名琛在一開始極力避免與英國交涉，其實完全合理，「因為當時外國的公使和領事，多是海盜流氓之類，蠻橫地執行侵略政策，如果假以顏色，他們一定糾纏不休，出言不遜，要求沒個底止」；¹⁸⁸後來戰爭爆發前，他改變態度開始交涉，有理有據地反駁英方最後通牒中各要求的理據，在作者看來，雖然「合情合理，並為繼續談判留有餘地」(維持原來看法)，但本質上還是「要對豺狼講理」(係新增)，徒費口舌。¹⁸⁹

¹⁸⁵ 這種刪減非常零碎，不便一一標出，僅舉幾個刪改較大的例子。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87(對應英文版頁 199-201)、149-150(對應頁 320-321、323-324)、272(對應頁 579-581)。

¹⁸⁶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60。

¹⁸⁷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67。

¹⁸⁸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49。

¹⁸⁹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90-91；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08.

對額爾金勳爵，新作中則絕口不提他的「偉大外交家」形象。博士論文中本強調額爾金勳爵在占領城市期間努力約束英國軍隊。如在廣州及北塘的劫掠活動中，由於他的約束，英國軍隊遠較法國克制，但這一看法在新作中不見蹤跡。¹⁹⁰此外原作中本來還經常引用額爾金勳爵反思這場戰爭正當性的言論，但現在則只說他是「侵略的老手」、「侵略狂人」，¹⁹¹甚至他的這些反思，也被視作「道貌岸然」，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強盜的善心」。¹⁹²

對一些中方次要人物、尤其是偏向支持和議者的看法，也因為對戰爭中中國形象的重新塑造，在新作中被略去不提，或完全改變。¹⁹³原書中對於道光(1821-1850)、咸豐時代辦理「夷務」的官員極為同情，不僅遺憾穆彰阿、耆英主導的鴉片戰後外交格局未能維持，還認為奕訢(1833-1898)、何桂清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無法繼續抵抗的時刻，選擇追求和平，是明智的判斷。¹⁹⁴舊作結語中蔣孟引對這些追求和平的官員有極高的評價：

然而中國仍有一些心態開放、瞭解外國情形的官員。他們知道無法以中國的儀式來約束外國風俗。他們有時對「外夷」的不滿佯裝不聞，避免對抽象名物的爭論，不拘小節，奉行了一種

¹⁹⁰ 如原來說對北塘的劫掠，「主要是法國人」做的，中文本則變為籠統的「他們」。對圓明園的劫掠，原來也強調法國軍隊更加恣肆。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190、214、216；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438, 484, 487.

¹⁹¹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122、220。

¹⁹²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135。

¹⁹³ 穆彰阿、耆英、奕訢、何桂清、薛煥、葉名琛的評價變化，見：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95, 280, 292-293, 300, 343；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46、123、131、136。

¹⁹⁴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81.

偉大的政策。領導這些人的是恭親王，儘管他比較晚才登上這一舞臺。¹⁹⁵

但後來這些不合時宜的看法全都被作者刪落或改寫。此外在討論中國軍隊的抵抗時，原來對於僧格林沁的防務評價非常高，現在卻傾向於貶低他的成績，¹⁹⁶並且經常在討論他主導的籌防活動時略去他的姓名。¹⁹⁷

然而所有上述變化，幾乎都只通過修改結論性語句以及增刪內容達成。原來博士論文中的章節結構、史料、敘事順序，大體都被保留下來。有時保留的內容，與新增的論述偶有齟齬；有時則是從完全相同的引文，論證出截然相反的觀點。這說明蔣孟引為構建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權威解釋，不得不在他服膺的現代史學觀念與新的學術權威之間，艱難地尋找一個平衡點。

(三)對舊權威與新權威的回應

在 1965 年的中文本中，與新舊兩種學術權威對話的篇幅大為增加。一方面，對馬士、柯斯丁兩人學術觀點的商榷，這時帶上了強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另一方面，新作大體順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史觀，表現出蔣孟引自己在政治上的改造。但同時他仍然希望結合現代史學觀念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積極建立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全面解釋，而非單方面順應權威說法。對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及胡繩等史學家的說法，有時他只是有保留的接受。他的著作雖在文革前夕遭

¹⁹⁵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596. 當然作者也注意到了恭親王在聯軍進攻之初，曾表現得非常強硬。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80.

¹⁹⁶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96。

¹⁹⁷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90、194。

到否定，但無礙於後來重新被推崇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部經典作品。

蔣孟引首要抨擊的舊權威，是代表作剛被翻譯為中文不久的馬士。¹⁹⁸馬士在 20 世紀上半葉就被蔣廷黻等視為中外關係史領域的絕對權威，而蔣孟引又在運動中瞭解到，連陳恭祿這樣的知名教授對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的認識，都受到馬士的支配。甚至在解放後出版的第一部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專著中，魏建猷(1909-1988)論述英國方面情形時，也經常依賴馬士的著作。¹⁹⁹這使得他將馬士選為新作中最主要的批評對象。對他的批評，無論是嚴厲程度還是頻率，都要遠遠超出對柯斯丁與蔣廷黻的批評——對此二人的批評主要是政治上劃清界限的表態。²⁰⁰雖然原作中偶爾透露出作者對馬士飽含偏見的不滿，²⁰¹但與馬士觀點的直接商榷，其實僅局限於毒麵包案與囚禁巴夏禮事件兩處。然而中文本中，對馬士的批評增加了多達六處。²⁰²不過，儘管此時蔣氏用詞比較激烈，批評馬士時經常上綱上線，如「顯示資產階級的侵略本性」、「故意捏造歷史」、「完全違反實際情況的胡說」，但客觀上看來，這些增加的學術批評，確實也改善了原作在學術對話上過於保守的問題，彰顯突破性與原創性。

新權威則全面重塑了這部書的整體論述方式。不僅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對過往人民起義形象、外國在華勢力與清政府角色的重構，直接

198 馬士(H. B.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一八三四——一八六〇年衝突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199 魏建猷引用的是馬士著作的日譯本，而且很多實際引用了馬士著作的地方，並未出註。H·B·モース、H·F·マクネーア著，喜入虎太郎、淺野晃譯，《極東國際關係史》，上卷(東京：生活社，1941)。

200 柯斯丁被稱為「現代英國資產階級學者」，蔣廷黻則是「帝國主義奴才」。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5、9、215。

201 Chiang,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206.

202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8-9、24、25、36-37、68、201。

扭轉了蔣孟引對太平天國與額爾金勛爵等人物的描寫，馬克思本人也是他寫作中需要回應的權威。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儘管很少在研究中深入討論中國問題，但 1850 年代馬克思僑居倫敦、窮困潦倒之際，為賺稿費補貼家用，曾給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撰寫過有關世界政治的社論。²⁰³這其中不少是對 1857 年後英國帕默斯頓勛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政府對華政策的批評。儘管這不像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等問題那樣，屬於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但馬克思本人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地位，使得蔣孟引在改寫舊作的時候，不得不學習「革命導師」的這些觀點——儘管他的舊作中從未提及馬克思。從中文本引述內容來看，蔣孟引主要利用的「課本」，是 1950 年重印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此外他肯定也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其他有關篇目。²⁰⁴然而，馬克思在社論中的主要觀點，其實並未被蔣孟引全部接受。

由於對帕默斯頓內閣抱有強烈的批評態度，視其獨裁傾向為議會民主制的阻礙，故而馬克思一般支持議會辯論中批評者的聲音。與蔣孟引一樣，他也認為亞羅號船照已經過期，並無所謂辱旗事件；²⁰⁵而聯

²⁰³ Morton Borden, "Some Notes on Horace Greeley, Charles Dana and Karl Marx," *Journalism Quarterly* 34:4 (December 1957): 457-465.

²⁰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這些篇目後來被收入 1957 年新版《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內，但不知為何蔣孟引沒有用這一更全的版本。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上海：解放社，195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這些文章作者權的辨認曾是一大難題。後來證明，馬克思〈中英衝突〉與恩格斯〈毒麵包案〉這兩篇係誤收。趙天鵲，《〈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方乃宜譯本考》(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頁 12。蔣孟引在修訂本中，引述了後來被證偽的恩格斯〈毒麵包案〉。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68。

²⁰⁵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上海：解放社，1950)，頁

軍在大沽口慘敗，則是卜魯斯堅持要從白河進京導致的，中國炮擊艦隊「並沒有破壞條約(《天津條約》)，而只是破壞了英人的侵略企圖」。²⁰⁶對於這些具體觀點，蔣孟引在改寫時加以引據，無需改變原來的看法。²⁰⁷

然而馬克思更傾向於認為帕默斯頓勳爵是這場戰爭背後真正推手的看法，卻與蔣孟引認為包令、巴夏禮將英國拖入戰爭的觀點相齟齬。這裡蔣孟引採取了折衷策略：保留原來的觀點，卻也引入馬克思的看法。在亞羅號事件討論上，增加對馬克思的引述，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論述的焦點。²⁰⁸

最值得留意的是中文本的新標題。眾所周知，第一次對華戰爭由鴉片走私與禁煙而起，故稱「鴉片戰爭」；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儘管是今日中外學術界通用的稱呼，但為何用鴉片來命名這場過程中並不包含鴉片糾紛的戰爭，並非簡單的問題。馬克思本人筆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附表2)，與後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闡述的含義並不相同。首先，這個表述主要指從亞羅號事件到《天津條約》簽訂為止的第二次對華遠征，並不像後來用法那樣還囊括直到簽訂《北京條約》為止的活動。其次，他只在討論對華貿易的幾篇文章中，使用「第二次鴉片戰爭」(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second opium-war, the opium war No. II)這類稱呼。總體而言他對三場戰爭的稱呼是比較隨意、多樣的。再者，他使用這一稱呼時，一般帶有強調這場戰爭與英國對華貿易關聯的意味。而且這一意味其實是非常諷刺的：英國為了拓展商業利益，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但其結果卻並不如其預想，所以決定再發動一場戰爭——不曾想這場戰爭卻是「破壞了它自己的目標」(To have baffled its own object,

53-55。下面如無特別說明，引據的皆是這一版本。

20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頁135。

207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148。

208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50-51。

seems, therefore, the most obvious result of the opium war No. II), ²⁰⁹損害了英國從鴉片貿易中能夠攫取的利益。一方面，馬克思認為第一次對華戰爭取得的條約，不能帶來預期的商業增長，原因是鴉片貿易與正式貿易構成零和關係。²¹⁰另一方面，第二次戰爭在他看來，卻必然會使得中國將鴉片種植與鴉片貿易合法化。這會給英國的鴉片貿易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英國政府不僅依賴鴉片貿易，還尤其「依賴於這個貿易底倫運性質」。²¹¹所以他口中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並不像後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界定的那樣，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擴展和深入」，²¹²而是鴉片貿易這一既得利益的諷刺性的消滅。²¹³

馬克思在戰爭命名問題上的特殊見解，從未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內被提及。而且儘管范文瀾、華岡(1903-1972)、戴逸(1926-2024)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曾在著作中引用他的評論，卻都對這場戰爭與鴉片的關係避而不談。他們更傾向於從兩次戰爭活動本身的目的與性質的一致性，而非鴉片貿易的角度，來為「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一命名提供理據。²¹⁴胡繩和丁名楠的書中，則像是完全忘記了命名理據問

²⁰⁹ 這裡的譯文用的是 1957 年本的譯文，比舊譯本更能還原馬克思的文風。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 95；Correspondence of The N. Y. Tribune,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Treaty,” *New York Daily Tribune*, October 15, 1858.

²¹⁰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頁 91-92。

²¹¹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頁 102。

²¹² 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1。

²¹³ 相關討論見：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32; Eugenio Lo Sardo, “Karl Marx and the Opium War,” in *Probings and Re-Probings: Essays in Marxian Reawakening*, eds. Sankar Ray and Shaibal Gupta (London: Routledge, 2022), 345-351.

²¹⁴ 華崗編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卷 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題一樣。²¹⁵真正從鴉片貿易角度為「第二次鴉片戰爭」提供命名理據的學者，反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並不十分認同的學者黃宇和。他認為鴉片貿易的暴利維持著大英帝國的統治與工業發展，故而不得不「以修約為藉口，勸說清廷將鴉片貿易合法化」。²¹⁶相較於馬克思本人和後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黃宇和提供的這套經濟解釋反而更加精緻完善，也有更廣的影響力。

蔣孟引在修訂之時，雖然採取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一稱呼，但也表現出對命名問題懸而不決的傾向。在新的序言和結語中，只提到最終條約內包含「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內容，此外不曾提起鴉片問題。²¹⁷這或許與馬克思本人的命名初衷，很難為中國人接受有關。他的定義完全從英國貿易發展的角度出發，本意是批評當時關於中英貿易發展的流行觀點，而並不強調中國在融入近代世界時所經歷的不公與苦難。²¹⁸但蔣孟引也不忘駁斥蔣廷黻「修約戰爭」這一命名，因為

店，1951 增訂本），頁 231、241；戴逸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 302；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 1 分冊（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頁 178。

215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丁名楠，《帝國主義侵華史》，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重印本），頁 163。

216 黃宇和，《帝國主義的鴉片 1800–1860》，頁 175。但是正如黃宇和自己所說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兩次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s)在他的著述出來之前，就被許多英文世界的書籍用作標題了。這是很難解釋的一件事。黃宇和，〈21 世紀初西方鴉片戰爭研究反映的重大問題——從近年所見的三部鴉片戰爭史研究著作說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1（北京，2013），頁 91。

217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274。

218 但近來也有學者指出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發表這些有關中國和印度的評論前後，對殖民主義的態度發生了從樂觀到持批評立場的變化。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28-37.

它明顯帶有合理化聯軍挑起戰爭行為的意味。²¹⁹同時，他也努力增補對導致戰爭爆發的經濟因素的討論，並在這樣的討論中努力引述馬克思的看法。²²⁰

命名問題上反映出的缺乏權威解釋，以及無法照搬經典作家觀點的問題，正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非只是絕對權威自上而下改造史學家的過程。學術權威並未在一開始便提供所有答案，正是史學家的積極參與，促成了史學權威的界定、豐富與不斷重塑。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許多問題的闡釋取向，在 1950 年代後仍有遷移，如中蘇關係變化影響著對沙俄侵奪中國領土這段歷史的書寫。²²¹蔣孟引修改後的著作之所以沒能在當時受到認可，被丁名楠在《歷史研究》上撰文批判，²²²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史學權威本身的不穩定性。

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史中，由於時段重合，如何論述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的關係，各家之間最初並未形成共識。如范文瀾將它們分作兩個較為獨立的專題，²²³而胡繩則偏重講述太平天國運動，並只在這個背景下來討論第二次鴉片戰爭。²²⁴然而經過歷史分期討論後，「三次革命高潮」的說法基本得到公認，1950 年代末，第二次鴉片戰爭愈發被劃歸為太平天國運動史的一部分。1957 年教育部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試行教學大綱》不僅確認了這一主次關係，甚至定

219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9。

220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頁 27-31。詳見前文討論。

221 趙慶雲，〈中國近代史書寫中的沙俄侵略〉，《二十一世紀》，143(香港，2014)，頁 33-43。

222 南木，〈評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研究》，1965：5(北京，1965)，頁 99-108。

223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 1 分冊，頁 iii-iv。

224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頁 19-49。

調英法發動戰爭，就是為了鎮壓國內革命，²²⁵影響到此後的一批通史著作。²²⁶所以丁名楠批評的一大重點，便在蔣孟引這部書「對當時席卷全國的農民戰爭視若無睹，對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與清政府對外態度、對外政策的關係避而不談」，而「當時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震天動地的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階級搏鬥」，才是「中國社會的一切矛盾的焦點」。²²⁷

但蔣孟引不可能不瞭解這一趨勢。他未採取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視角與階級分析辦法(上文談到，實則有相關改寫)，未嘗不是有意為之。這顯然超出了他所篤信的現代史學方法所能支持的論述限度。比照丁名楠的批評與他已做出的修改，不難看出他幾乎預料到了舊作中不符合新權威期待的各方面內容。然而他仍然有許多不願隨便更改的結論。如舊作中最後一章，儘管經過部分改寫，但仍顯得過於強調英法俄美四國間的矛盾而非「侵略者」之間的「共謀」關係，在當時情境下幾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討論。而經修改後對葉名琛接近於自我矛盾的評價，更是模糊了清朝政府及其官員的形象。²²⁸這也說明蔣孟引仍按照其認知的現代史學觀念，嘗試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史領域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權威地位。

儘管此後還寫作了個別文章，²²⁹但蔣孟引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

225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訂，《師範學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試行教學大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頁 13-20。

226 李育民，〈林增平《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建立〉，《近代史研究》，2024：3(北京，2024)，頁 35-52。

227 南木，〈評蔣孟引著《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研究》，1965：5，頁 102-103。亦見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卷 1，頁 101-188。

228 基於人民史觀的一種權威觀點，即葉名琛屠殺廣東人民，見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 1 分冊，頁 184、188。

229 最晚的相關發表，見蔣孟引，〈歷史的教訓——亞羅之戰和大沽之戰〉，

究，基本止步於文革前夕丁名楠的這篇書評。改革開放後，他與他的學生們，則更希望營造出自己這項研究自一開始便揭露英國戰爭罪行、彰顯中國人民英勇抵抗的形象。那種以太平天國為核心視角、強調階級鬥爭的通史框架，也在當代學術走向專業化後逐漸被官方放棄。²³⁰ 蔣孟引這部強調原始史料分析的著作，價值愈發突顯。此後這部書才逐漸被學者普遍視為馬克思主義典範下的代表作品，並在數十年後得以再版。²³¹

七、結語

與第一次鴉片戰爭相比，第二次鴉片戰爭史在中文世界長期以來便是研究薄弱的領域。不僅中文專著數量極少，過去的通史著作也常把它與鴉片戰爭或太平天國運動合併討論，不設獨立章節。²³² 在十分有限的著作中，蔣孟引的博士論文不僅是中國人就此論題以西方現代史學方法完成的第一部專著，其本人也是 1930 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創生時期一個備受忽視的先行者。韋伯斯特推崇的國際主義理念與西方現代史學方法，影響了蔣孟引的政治學術理想，同時也間接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科學研究的創生。這部書的改寫歷程，不僅呈現出蔣孟引個人政治學術理念的延續與轉變，還集中展示了二十世紀中國如何引入西方現代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兩度重塑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歷史解釋，進而重構對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歷程的認識。留學生群體對 1930

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頁 326-333。

²³⁰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頁 39-53。

²³¹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²³² 華崗編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卷 1（重慶：讀書出版社，1940）。此書後來版本中才有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獨立章節。

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起源與早期發展的貢獻，仍有待繼續發掘、探討。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秩序的激變給蔣孟引的人生帶來許多重大變化。與後來蔣孟引及其周圍人等力圖重塑的形象不同，他的博士論文並未奉行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而他早年的政治與文化活動，也未反映出他對中共政權與馬克思主義的好感。在青年時期他就提出追求獨立人格、遠離政黨政治的主張。歸國後任教中央大學，更是曾在重慶積極參與第三方面的政治活動，抱有悖離兩黨實際利益的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理想。然而 1949 年後，他無可避免地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與學術思想，一面另闢園地，全面轉入世界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一面積極響應運動號召，在各類寫作中表現自己思想的改造；另一面則努力修改自己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附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解釋。作為博士論文底色的那種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並存的政治與國際關係理念，在新作中不見蹤影。

然而這並不只是又一個拋棄過去的自我，而後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故事。各國現代史學的創生，往往都與國族建構等政治目標大有關聯，並非純然追求客觀真理的事業。²³³中國現代史學的早期發展也不例外。蔣孟引從青年時代起，便對現實政治有深切關注，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也未劃出一道清晰的界限。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以服務政治為目的寫作，在 1949 年前的蔣孟引身上便有先例。蔣孟引強調原始檔案，追求建立史學的客觀性，並不意味著他是遠離政治的書齋學者。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做法，恰恰與他早年在中央大學與韋伯斯特那裡經受的教育一脈相承。另一方面，蔣孟引雖然經歷連續不斷的政

²³³ Lisa Yoshikawa, *Making History Matter: Kuroita Katsum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 1-19; Donald Wrigh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English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45, 50.

治運動，見證了學術氛圍的劇變，但在公開表現自我政治改造的同時，仍默默在實踐上堅持自早年便篤信的學術信念。儘管改定後的新著響應全新的歷史解釋，將第二次鴉片戰爭描寫為一場貪婪且毫無理據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但蔣孟引並未選擇放棄舊作，另寫一部以論帶史風格的小書。這說明他仍然篤信現代史學所強調的原始檔案研究，並期望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基本觀點的權威說法。因不符合當時將第二次鴉片戰爭置入太平天國運動來討論的詮釋取向，這部書遭到了丁名楠在《歷史研究》撰文批判缺乏階級觀念、立場錯誤，卻在數十年後重新被奉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典作品，也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非僅僅是權威單方面改造史學家的故事，而是同樣包含史學家主動參與塑造、改造權威的互動過程。蔣孟引的新作正因為努力在現代史學方法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努力建立平衡，才在那一時代被淘汰的許多著作中脫穎而出，至今仍是一部研究者必須參考的專著。

(本文於 2024 年 3 月 14 日收稿；2025 年 1 月 14 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先由業師戴海斌教授組織同門討論批評(周雨斐、鄭澤民老師亦提供意見)，復蒙屠含章、高昊兩位老師提示重要思路，最後由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詳細的修改建議，均此致謝！另十分感謝來自湖南圖書館古籍閱覽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復旦大學文科圖書館過刊庫、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女性圖書館等處曾給予本人幫助的工作人員！本文之資料調查，受到「復旦大學文科專項博士生國際訪學資助項目」的資助，感謝霍氏家族基金會、復旦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的支持。

附表 1 蔣孟引在中央大學時期的成績單

學期	課程	學分	成績	課程	學分	成績	總學分	平均分
十七年上	各體文選	3	75	預科算學	3	80	19	79
	預科英文	4	70	社會科學概論	2	76		
	公文程式	1	80	哲學大意	3	81		
	普通體育	1	80	中國地理	2	98		
十七年下	各體文選	3	78	預科算學	3	73	21	76
	預科英文	4	72	社會科學概論	2	87		
	黨義	2	70	中國地理	2	92		
	普通生物學	4	72	普通體育	1	70		
十八年上	西洋上古史	2	90	西洋中古史	2	92	19	82.7
	中國中古史	2	80	本科英文	3	73		
	國學概論	2	87	氣象學	3	80		
	中國上古史	2	74	歐陸地理	2	95		
	普通體育	1	76					
十八年下	西洋近古史	3	73	中國近世史	3	80	18	77.8
	中國近古史	3	85	國學概論	2	87		
	本科英文	3	76	社會變遷	3	70		
	普通體育	1	75					
十九年上	西洋文化史	4	70	中國文化史	4	85	20	78.5
	實用英語語音學	3	70	文學史綱要	2	76		
	初級法文	3	86	論理學	3	83		
	普通體育	1	80					
十九年下	中國文化史	4	79	西洋近世史	3	89	19	76.8
	俄國近代史	3	88	教育原理	3	60		
	初級法文	3	68	法理學	2	73		
	普通體育	1	83					
二十年上	德國現代歷史哲學	3	72	西洋哲學史	3	86	21	83.6
	西洋文化史	3	92	西洋現代史	3	85		
	中級法文	2	65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3	90		
	清史	3	90	普通體育	1	80		
二十年下	西洋現代史	3	85	西洋文化史	3	74	21	79
	西洋哲學史	3	85	史前史	3	67		
	清史	3	90	莊子哲學	3	75		
	中級法文	2	75	普通體育	1	80		

二十 一年 上	西洋近代文化史	3	70	西洋最近史	3	90	16	72.8
	史學通論	3	73	史前史	3	70		
	初級日文	3	60	普通體育	1	76		

資料來源：〈中大文學院史學系畢業生歷年成績單〉，《國立中央大學》，檔號 648-3935。
學期數按原表以民國紀年表示，總學分、平均分除十八年上學期原缺，經計算後補入外，
均為原表數據。從收錄的全部史學系畢業生成績單來看，一學期的均分在 70 分以上已屬
不錯，80、90 多分則是少見的高分。

附表 2 馬克思、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中對三次對華戰爭的稱呼

文章出處	第一次戰爭稱呼	第二次戰爭稱呼	第三次戰爭稱呼
1853-6-14-4	the unfortunate war of 1840		
1857-4-10-4	the opium war		
1857-4-17-4(E)	the expedition of 1841-42	a new military and naval expedition; the new expedition	
1857-6-5-6(E)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the war of 1840 to '42	the new Anglo-Chinese war	
1858-9-20-4	the war of 1841-42; the first Chinese war; the first opium-war	the war of 1857-8; this second opium-war	
1858-9-25-4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the second opium war	
1858-10-15-3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first Chinese war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opium war No. II; this second China war	
1859-9-27-5		the last Chinese war	the new Chinese war ²³⁴

²³⁴ 1859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 日、10 月 10 日、10 月 19 日都用了“The New Chinese War”作為標題。為避煩瑣，下三項不一一錄入。

1859-10-1-6	the opium war	the last Chinese war; the second Chinese war	another Chinese war; the impending third Anglo-Chinese war; a third Chinese war
1859-10-10-4		the last Chinese war	a new Chinese war
1859-10-18-6	a first Chinese war	the Lorch war; a second war	the impending third China war
1860-2-14-6		the second Chinese war; Palmerston's second Chinese war	the third Chinese war

資料來源：New York Daily Tribune。馬克思、恩格斯撰寫的這些社論，原來有一些沒有標題。本表用年-月-日-版次的格式註出，如為恩格斯撰寫，則標註（E）。該報線上訪問地址見：Library of Congress, "New-York daily tribune,"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30213/issues/>, accessed July 3, 2023. 另參考已經整理的文字版：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Articles by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subject/newspapers/new-york-tribune.htm>, accessed July 3, 2023.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檔案

上海市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一覽·第十二種·學生錄》，1930，檔號 Y8-1-809。

上海市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手冊》，1935，檔號 Y8-1-814。

上海市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姓名錄(二十一年度下學期)》，1932，檔號 Y8-1-12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檔號：648-1041, 648-1144, 648-1146, 648-1147, 648-1277, 648-1916, 648-2288, 648-3935。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apers of Sir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

Reference number: Webster 1/16, Webster 1/17.

(二) 非公開出版物

《中央大學二二級畢業紀念刊》，Shanghai: The Willow Pattern Press, 1934。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編印，《桃李芬芳：南京大學歷史系110周年紀念冊》，2012年5月。

蔣孟引，《世界近代史》，油印本教材，1954。

蔣孟引，《英國史論叢》，南京：南京大學教材科，1964。

Chao, Tang-Li (趙唐理).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8-187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1.

Chiang, Pei-Huan (蔣百幻).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186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39.

The Calendar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for the Forty-Second Session, 1936-37.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1936.

(三) 報紙、期刊

- 《人民日報》(北京)。
《大公報》(重慶)。
《大學評論》(南京)。
《史學》(上海)。
《史學戰線》(南京)。
《史學雜誌》(南京)。
《民國日報》(上海)。
《民報》(上海)。
《申報》(上海)。
《江海學刊》(南京)。
《南京大學》(南京)。
《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南京)。
《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南京)。
《教學與研究彙刊(人文科學)》(南京)。
《現實》(南京)。
《學識》(南京)。
《歷史研究》(北京)。
《衡風》(南京)。
《讀書》(北京)。
《讀書通訊》(重慶)。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ondo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ew York.

(四) 訪談、自述、回憶錄與日記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費孝通，〈留英記〉，收入費孝通著，《費孝通全集》，卷8，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

出版社，2009，頁 90-119。

黃啟芳，〈知識來自勤奮——訪蔣孟引教授〉，《外國史知識》，33(北京，1983)，頁 23-25。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蔣孟引，〈雷海宗先生給我的教益〉，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3-114。

錢端升，《錢端升日記(1937-1956)》，上冊，收入黃進、高浣月主編，《錢端升全集》，第 2 輯第 4 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3。

韓德培，〈韓德培自述〉，收入高增德、丁東編，《世紀學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頁 251-268。

(五) 方志

新寧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新甯縣志》，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六) 時人著述

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卷 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重印本。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訂，《師範學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試行教學大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沈剛伯，《沈剛伯先生文集》，上、下集，臺北：中央日報出版部，1982。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 1 分冊，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

夏笠，《第二次鴉片戰爭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夏燮，《中西紀事》，長沙：嶽麓書社，1988。

馬士(H. B.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1 卷《一八三四——一八六〇年衝突時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上海：解放社，1950。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華崗編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卷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 增訂本。
- 華崗編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卷1，重慶：讀書出版社，1940。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慶：青年書店，1939。
- 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 蔣孟引，〈從對亞羅事件的分析看陳恭祿先生的歷史觀點——評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中的一頁〉，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365-379。
- 蔣孟引，〈駁斥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理由」〉，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334-364。
- 蔣孟引，〈歷史的教訓——亞羅之戰和大沽之戰〉，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326-333。
- 蔣孟引，《英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
- 蔣孟引，《第一次世界大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
- 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 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蔣孟引主編，《英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 錢乘旦，〈跋：回憶我的老師蔣孟引先生〉，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492-501。
- 戴逸編著，《中國近代史稿》，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 H·B·モース、H·F·マクネーア著，喜入虎太郎、浅野晃譯，《極東國際關係史》，上卷，東京：生活社，1941。
- Costin, W. C.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 Leavenworth, Charles S. *The Arrow War with China*.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1901.
-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 Tsiang, T. F (蔣廷黻). "The Secret Plan of 1858."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2 (July 1931): 291-299.

二、近人論著

(一) 專著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王靜，《近代中英教育交流史》，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1784年~1894年)》，臺北：三民書局，1985第2版。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北京：中華書局，2013。

姚廷芳，《新閉關時期與英法聯軍》，臺北：三民書局，1982。

姚遠，《西序弦歌：西北聯大簡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20。

黃宇和，《帝國主義的鴉片 1800–1860》，香港：中華書局，2021。

虞雲國，《學隨世轉：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趙天鷺，《〈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方乃宜譯本考》，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

趙慶雲，《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史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蔣寶麟，《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Anderson, Kevin B.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Dahrendorf, Ralf. *LSE: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895–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Fan, Xin (范鑫).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Hsü, Immanuel C. Y. (徐中約).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Matten, Marc Andre and Yang Zhao (楊釗), *The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Role of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1912–1949)*. Erlangen: FAU University Press, 2023.
- Wang, Q. Edward (王晴佳).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 Wang, Tseng-tsai (王曾才).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China's Management of Foreign Affairs: Sino-British Relations 1793-1877*. Taipei: China Committee for Publication Aid & Prize Awards under the auspices of Soochow University, 1972.
- Wong, J. Y (黃宇和).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ong, J. Y. *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right, Donal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English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 Yoshikawa, Lisa. *Making History Matter: Kuroita Katsum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

(二) 論文

- 〈附錄：蔣孟引先生學術年譜〉，收入蔣孟引，《蔣孟引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502-503。
- 左雙文、陳偉，〈1948 年「反美扶日」運動及其與國民政府的互動〉，《廣東社會科學》，2006：6(廣州，2006)，頁 101-107。
- 朱洪斌，〈齊思和論中國近代史學之變遷——〈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晚清史學的發展〉校讀記〉，《漢學研究》，41：3(臺北：2023)，頁 169-208。
- 宋逸煒，〈近代歷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學月刊》，2019：3(開封，2019)，頁 71-81。
- 宋逸煒，〈蔣孟引和他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學海》，2017：4(南京，2017)，頁 211-216。
- 李育民，〈林增平《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建立〉，《近代史研究》，2024：3(北京，2024)，頁 35-52。

- 李昊，〈蔣孟引史學研究〉，揚州：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
- 李政君，〈唯物史觀與1949年後顧頡剛的古史研究〉，《中國史研究》，2017：3(北京：2017)，頁19-30。
-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42：4(臺北，2004)，頁41-81。
- 茅海建，〈入城與修約：論葉名琛的外交〉，《歷史研究》，1998：6(北京，1998)，頁73-92。
- 曾冠傑，〈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及其前後(1949-1952)：以南京大學為中心的考察〉，《政大史粹》，18(臺北，2010)，頁99-126。
- 黃宇和，〈21世紀初西方鴉片戰爭研究反映的重大問題——從近年所見的三部鴉片戰爭史研究著作說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1(北京，2013)，頁84-93。
- 黃相輔，〈從反動右派到史學宗師：雷海宗生前身後的起落〉，《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61(臺北，2024)，頁129-170。
- 溪廣慶，〈前言〉，收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頁1-2。
- 葛夫平，〈建國以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研究綜述〉，《史林》，2014：2(上海，2014)，頁164-180。
- 翟韜，〈後殖民視野下的中美輿論宣傳戰(1949-1951)〉，《美國研究》，2023：1(北京，2023)，頁138-160。
- 趙慶雲，〈中國近代史書寫中的沙俄侵略〉，《二十一世紀》，143(香港，2014)，頁33-43。
- 劉曉琴，〈中英庚款留學生研究〉，《南開學報》，2000：5(天津，2000)，頁72-79。
- 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新史學》，8：2(臺北，1997)，頁133-185。
- 蔣寶麟，〈「史學南派」：民國時期中央大學歷史學科的學術認同與「學派」分際〉，《史學史研究》，2014：2(北京，2014)，頁55-66。
- 錢乘旦，〈英國史研究的奠基人——蔣孟引教授〉，《世界歷史》，1995：1(北京：1995)，頁86-89。
- 戴海斌，〈「批評」如何可能？陳恭祿與蕭一山筆戰述評(上篇)〉，《中國文化》，55(北京，2022)，頁293-325。
- 戴海斌，〈邵循正史學三題〉，《歷史教學問題》，2022：5(上海：2022)，頁51-66。

- Borden, Morton. "Some Notes on Horace Greeley, Charles Dana and Karl Marx." *Journalism Quarterly* 34:4 (December 1957): 457-465.
- Ehrhardt, Andrew. "A 'Great Power' Man or World Stater? 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 1886-1961."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4 (December 2023): 1116-1141.
- Grover, Caroline. "Reflections on Stat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Historical Pedagogy: Accounts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in Chinese Middle-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from 1912 and 200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9.
- Hall, Ian. "Art and Practice of a Diplomatic Historian: Sir Charles Webster, 1886-1961."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4 (December 2005): 1-21.
- Lo Sardo, Eugenio. "Karl Marx and the Opium War." In *Probings and Re-Probings: Essays in Marxian Reawakening*, edited by Sankar Ray and Shaibal Gupta, 345-351. London: Routledge, 2022.
- Manning, David. "Introduction." In *Talking History: Seminar Culture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21-2021*, edited by David Manning, 1-9.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24.
- Yu Wenjie (于文杰) and Xu Sangyi.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Jiang Mengyin." *World History Studies* 3:1 (June 2016): 91-104.

三、網路資料

- 〈英國史教學科研人員登記表〉(1981年11月5日)，《孔夫子網》，<https://book.kongfz.com/10196/1015743583/>, 擷取日期：2023年7月3日。
-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尋訪故舊 感慨良多——蔣以亮女士探訪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紀實〉，<https://history.nju.edu.cn/05/61/c28497a460129/page.htm>, 擷取時間：2023年7月3日。
- 陳曉律，〈回憶 80 年代的蔣孟引先生〉，<https://history.nju.edu.cn/8a/c5/c29372a494277/page.htm>, 擷取日期：2023年7月3日。
- 戴寧生，〈南大從前有個小陶園〉，<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452/202304/7119.html>, 擷取日期：2023年7月3日。
- Chiang, Pei-Huan. "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1856-60." <https://ethos.bl.uk/Order>

tails.do?uin=uk.bl.ethos.675406. Accessed July 3, 2023.

Library of Congress. "New-York daily tribune."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30213/issues/>. Accessed July 3, 2023.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Articles by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subject/newspapers/new-york-tribune.htm>. Accessed July 3, 2023.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 G. Robinson and Students, c1930s." <https://archives.lse.ac.uk/records/IMAGELIBRARY/317>, accessed December 27, 2024.

Armed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t Wars: Jiang Mengyin and Two Transforma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Zi-cheng Zo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The study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veals a nuanced interplay between historiography, politics, and worldview. Two significant examples—Jiang Mengyin's 1939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his revised 1965 Chinese monograph—illustrate how Western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reshaped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Supervised by C. K. Webster, Jiang's dissertation adopted an internationalis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narratives. It portrayed the war as a consequence of Britain's failed diplomacy and subsequent "armed diplomacy," while framing China as committed to making peace. Though the work acknowledged some justifications for "armed diplomacy" put forth by British scholars, it largely rejected them, placing primary blame on Britain. Jiang's 1965 monograph, however, advanced a Marxist critique of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mid frequent political movements on campus,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ed Jiang's thought reform. Nonetheless, the revised work also represented an ambitious attempt b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to intervene in the under-researched field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Although Ding Mingnan criticized the work for diverging dominant

interpretative practices, it later gained recognition as a classic in the field. This article not only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Jiang'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thought but also broader shif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underscores both the diversity inher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overlooked continuities in the intellectual experiences of historians shaped by a Marxist worldview.

Keywords: Jiang Mengyin, the Second Opium War, historical writing,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